

第二章 峇峇的馬來語翻譯文學

第一節 峇峇馬來語報章雜誌的出版

峇峇馬來語翻譯文學作品最早的發表園地主要是在峇峇人創辦的刊物，因此，在深入探及峇峇馬來語翻譯作品之前，我們有必要先對早初峇峇人以峇峇馬來文編寫的報章雜誌有一定的瞭解。從表 3-1 我們可以瞭解到，創辦峇峇馬來語刊物的時間縱深主要集中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從 1894 到 1908 年的十五年之間，峇峇人曾以羅馬化的峇峇馬來文為媒介陸續辦了七份報紙和四份雜誌，其中包括了三份峇峇馬來文暨英文、一份峇峇馬來文暨漢文的刊物。反觀早期馬來人本身所創辦的馬來文刊物，其書寫文體皆以阿拉伯字母演變過來的爪夷文（*Tulisan Jawi*）為主；馬來人第一份以羅馬化馬來文發表的期刊 *Suara Perniagaan*（中譯：《貿易之聲》）於 1919 年創辦於新加坡，只是從第五期開始，該期刊又改以爪夷文發表。而第一份馬來人辦的羅馬化馬來文報紙 *Warta Negeri*，則遲至 1929 年 5 月 27 日才在吉隆坡誕生¹。可以說，在新、馬地區，馬來語的羅馬化書寫文體最早呈現在峇峇人創辦的報刊雜誌上，以第一份羅馬化馬來文刊物出現的時間計算，峇峇人的創舉比馬來人自己以羅馬化馬來文創刊的時間提早了超過二十年。

在峇峇馬來文報刊方面，《土生華人報》（*Surat Khabar Peranakan*，亦稱 *Straits Chinese Herald*）是峇峇人辦的一份刊物，1894 年 1 月 22 日於新加坡創刊，創刊號上言明五大宗旨：

1. 協助英語能力不足者，尤其大部分從事商業活動的海峽華人提高亞太知識。
2. 為那些看不懂英文報的海峽華人或亞洲人提供其居住地相關的社會、政經新聞。俾使他們的學習權利不因語言障礙被剝奪。
3. 協助讀者掌握英語知識。
4. 提供歐洲人學習商用馬來會話的空間。
5. 提供園地予對公共議題感興趣者發表言論。

這樣的開宗明義透露了一個事實：19 世紀末峇峇社會普遍上的英語能力仍是不足；這也間接說明了因何這時候由海峽華人知識份子興起的峇峇翻譯文學選擇羅馬化峇峇馬來文而非英文作為文學的媒介語。該日報（星期日不發刊）主要以羅馬化峇峇馬來文（新聞及故事欄）及英文（廣告欄）雙語出版，內容以本地新聞及廣告為主，偶爾穿插一些特別報導和故事。這份刊物壽命不長，創刊同年 5 月 7 日，它被併入英文報 *Daily Advertiser*，惟 *Daily Advertiser* 也於不久後夭折（1894 年停刊）。

接著出現的是 1894 年 7 月 2 日由宋旺相（*Song Ong Siang*）及陳文進（*Tan Boon Chin*）合辦的《東方之星》（*Bintang Timor*），這份報紙的重要性在於它是

¹ William R. Roff., *Bibliography of Malay and Arabic Periodicals published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and Peninsula Malay States 1876-1941*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35, 42.

新馬第一份完全以羅馬化馬來文創辦的報紙。每份報紙共四版，內容主要以國內外新聞和社論為主，透過社論我們可以閱讀到海峽華人對於當時國內外時事的眼光，諸如中日戰爭、馬來語教育等問題，都是他們關注的焦點，值得注意的是，該報也收入了不少文藝作品（見附錄3），包括了詩歌（Pantun體和Syair體）、故事、笑話及謎語（teka teki）等。在最初的九個月，這份報紙（除星期日外）天天出刊，最後三個月則改為每星期出刊三次。惟由於辦報經費吃緊，加上訂閱成績不理想等問題，這份報紙一年後也宣告壽終正寢²。值得一提的是，這份報紙最熱心的贊助人及投稿人之一，是當時柔佛的拿都敏達拉魯阿（Dato Bintara Luar of Johore）³。

1910年經營船務公司的吳清林（Goh Cheng Lim）創辦了《馬來西亞提倡者》（*Malaysia Advocate*），主要旨在提供海峽華人一些世界新聞，特別報導外國及其人民的進步情況，以增進海峽華人的見聞。這份報紙停刊時間不詳，但是根據宋旺相記載，這份報紙和十五年前的《東方之星》（*Bintang Timor*）一樣短命⁴。之後1924年吳清林又與袁文成（Wan Boon Seng）合力創辦了《日常報》（*Kabar Slalu*），該報除了刊登新聞、廣告和社論，也刊登了不少文藝作品，其中有讀者投稿作品，例如蕭春龍（音譯，Siow Choo Leng）撰稿的儒學相關的文章（1924年1月5日，no. 1）、《懷孕娘惹的故事》（“Cherita Nyonya M’ngandong”，1924年1月7日，no. 2）、《是廣東，不是澳門》（“Negri Canton, bukan-nya Negri Macao”，1924年1月18日，no. 2）和一篇關於華人農曆新年的文章（1924年2月1日，no. 2）；較特別的是，這份報紙也首次連載了一些中國古典文學翻譯作品，其中包括了《白蛇與黑蛇》（*Cherita Ular Putay Sama Ular Itam*，由蕭海炎（Siow Hay Yam）翻譯，於1924年1月5日開始連載）、《梅良玉的故事（二度梅）》（*Cherita Mwee Liang Geok (Jee Toh Moey)*，由蕭海炎翻譯，於1924年2月22日開始連載）、《薛仁貴征西》（*Seeh Jin Quee Cheng Say*，由蕭欽山（Seow Chin San）翻譯，於1924年4月連載）。從1924年1月5日開始，該報則公告了即將於5月15日停刊的新聞。1926年峇峇馬來語及英語雙語週報《新新聞》（*Kabar Uchapan Baru*）創刊，但1927年後改為雙週刊直到1931年停刊。1928年袁文成與林君良合辦了巫華雙語的《商業報》（*Perdagangan*），最後根據William R Roff的記錄，1931年出版了一份名為《東方之星報》（*Kabar Bintang Timor News*）的報紙⁵，但這份報紙至今下落不明，出版地和語文也不詳。根據該報名稱推斷，應是峇峇馬來文、英文雙語報，我們再據創辦人Siow Hay Yam及O. S. Key推斷，出版地應在新加坡。

在峇峇馬來文雜誌方面，根據筆者查證，第一份現存最早用峇峇馬來語出版

² 詳見*Bintang Timor*, 1895年7月2日（vol. 2, no. 112），p. 2，編者感言。

³ 拿都敏達拉魯阿（Dato Bintara Luar of Johore），有說為馬來文學家文西·阿都拉之子。參見宋旺相，《新加坡華人百年史》[中譯本]（新加坡：新加坡中華總商會，1993），頁234。

⁴ 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John Murray: repr.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1923)), p. 348.

⁵ William R Roff., *Bibliography of Malay and Arabic Periodicals published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and Peninsula Malay States 1876-1941*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46.

的雜誌應是 1906 年在新加坡創辦的峇峇馬來語、英語雙語月刊——《峇峇之友》(*The Friend of Babas*)⁶，該雜誌由 Chew Cheng Yong 主編，Goh Hood Keng 及 Goh Leng Inn 助編，內容主要刊載廣告、社論、小說和基督教故事。該刊於 1908 年停刊。時隔 22 年後，新馬第一份完全的羅馬化馬來文雜誌才於 1930 年由袁文成創刊，這份逢星期日出刊的雜誌，《土生華人之星》(*Bintang Pranakan*)，內容除了連載中國翻譯小說：《後列國誌》(Ow Liat Kok Chee, 譯者為 Seng & San 即袁文成和蕭欽山，這份翻譯作品逾 1931 年分四冊出版)外，也刊載廣告、社論、國內外新聞、體育活動、讀者回應、幽默小品及詩歌等。這本刊物的銷路頗廣，範圍包括了馬來亞各大城市、砂勞越、廖內、爪哇及曼谷等地。只是，像其他峇峇馬來語刊物，這本雜誌也辦不久，根據 Roff 的記錄，該刊在出版了 34 期後於 1931 年 6 月停刊。

袁文成於 1932 年又創辦了另一份峇峇馬來文雜誌，名為《土生者之光》(*Sri Pranakan*)，該刊內容與 *Bintang Pranakan* 大同小異，只是這一次編者用了更多篇幅連載由“Seng and San”翻譯的中國文學作品 *Yeo Boon Kong Cheng Lam Ban* (《楊文廣征南閩》，本故事稍後於 1933-1934 年由袁文成分四冊出版)。其銷路同樣擴及馬來半島、曼谷、砂勞越及爪哇地區。另外 1934 年出版的《講故事者》(*Story Teller*)，則是專門用以連載中國文學翻譯作品《孟麗君》(*Beng Leh Koon*)的刊物，譯者為邱平炎 (Khuo Peng Yam)。該刊於 1935 年停刊，也宣告了峇峇馬來語刊物出版業的結束。整體而言，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新加坡已是海峽殖民地的政商及文化中心，出版業較為熱絡，且人才也多集中於此地，因此我們可以看到所有的峇峇馬來文刊物都在新加坡出版，而 1930 年代出版的峇峇雜誌則主要用以刊載峇峇馬來語翻譯作品，這段時期正是峇峇馬來語翻譯文學的全盛期。

⁶ 這份雜誌是筆者於 2003 年 3 月期間於新加坡國家圖書館發現，以微卷形式收藏於該館參考部主館，此雜誌在陳志明、張麗珍及 Yoong Suan Kui 等人的著作中接未提及，原因不詳。惟筆者檢閱該份報章，發現其媒介語之一屬峇峇馬來文，故將之列入本表。(參考：Tan Chee Beng, “Baba Chinese Publication in Romanized Malay”, in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No. 22, 1981 (Tokyo: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Asia and Africa), pp. 158-153; Teo Lay Teen, *A Study of The Malay Translation of Chinese popular fiction by the Baba Chinese--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Khian Leong Koon Yew Kang Lam”*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1980), pp. 22-28; Yoong Suan Kui, *A Bibliography Survey on Baba Literature: Focus On Chinese Literary Translated Works into Baba Malay*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2001), pp. 15-17.)

表 2-1：峇峇馬來語刊物（含雙語）

類別	刊物	創辦人或參與者	發刊時間 (年/月/日)	語文	出版地
報紙	Straits Chinese Herald (or Surat Khabar Peranakan)	不詳	1894/01/22~1894/05/07	BM, E	S
報紙	Bintang Timor	Song Ong Siang, Tan Boon Chin	1894/07/02~1895/07/02	BM	S
雜誌	The Friend of Babas: a magazine for the social and moral progress of the Straits Chinese (a monthly magazines for Straits-Chinese People)	Chew Cheng Yong (Ed.), Goh Hood Keng (As. Ed.), Goh Leng Inn (As. Ed.)	1906/07~1908/01	E, BM	S
報紙	Malaysia Advocate	Goh Cheng Lim	1910~?	BM	S
報紙	Kabar Slalu (or Daily News)	Goh Cheng Lim, Wan Boon Seng	1924/01/05~1924/05/16	BM	S
報紙	Kabar Uchapan Baru (or Eastern Weekly Review)	Siow Hay Yam (tr.)	1926/02/04~1931/01	E, BM	S
報紙	Perdagangan	Wan Boon Seng, Liem Koen Liang	1928/01~?	BM, C	S
雜誌	Bintang Pranakan: Straits-born Chinese Romanized Malay Weekly	Wan Boon Seng	1930/10/11~1931/06	BM	S
報紙	Kabar Bintang Timor News	Siow Hay Yam, O.S. key	1931/10~?	不詳	不詳
雜誌	Sri Pranakan	Wan Boon Seng	1932/04~?	BM	S
雜誌	Story Teller	不詳	1934/06/30~1935/10/12	BM	S

附註：BM=峇峇馬來文，E=英文，C=華文；S=新加坡

第二節 峇峇馬來語翻譯文學的發展

經過資料的核對分析，峇峇馬來語翻譯作品（見附件 2），扣除三部再版作品，即曾錦文(Chan Kim Boon，下同)翻譯，由其子曾衍派(音譯，Chan Yen P'ai)分別於 1932、1933 及 1934 年再版的《三國》、《西遊》、《宋江》三部作品，目前所能發現到的有將近 80 部譯作，這其中包括了 1 部民間故事翻譯《憨子婿》、2 部宗教性譯本（《立願寶鑒》，兩部同名）、2 部民間敘事詩《三伯英台詩》、1 部《三伯英台》劇本及 74 部中國通俗小說翻譯。而翻譯的時間主要集中在 1889 年至 1950 年之間，另外兩部則零散於 1963 年（黃福慶，《三伯英台詩》(Sha'er San Pek Eng Tai)）及 1985 年（Felix Chia，《三伯英台》劇本）出現。

另外，從作品數量的統計歸納（見表 2-2, 圖 2-I），整個峇峇馬來語翻譯文學的發展出現了三段明顯的起伏，即第一階段從 1889 年至 1929 年為止，40 年間共出版了 32 部作品，且每五年平均都有作品出現，出版的情況起伏不大，但有逐漸下降的趨勢，至 1925 年則嘎然而止出現將近 5 年的空窗期，這段時間可視為峇峇馬來語翻譯文學的初興時期。第二階段主要集中在 1930-1939 年，短短

10 年間卻出版了近 40 部翻譯作品，完全展現出峇峇翻譯文學全盛期的蓬勃發展。第三階段從 1940 年開始，直到 1950 年只出現了 1 部作品，之後中國通俗小說的峇峇馬來語翻譯工作便告停止，13 年後雖出現了有史以來的第一部中國詩歌翻譯作品——黃福慶翻譯的《三伯英台詩》(Sha'er San Pek Eng Tai)，之後再過了更長的 22 年則出現另一個驚喜——Felix Chia 的劇本翻譯《三伯英台》(Sam Pek Eng Tai)，然而，迄至 1985 年將近 45 年的歲月，我們明顯看到這期間峇峇馬來語翻譯文學的一蹶不振，因此筆者將之視為「沒落期」。簡言之，峇峇馬來語翻譯文學的發展是與峇峇人所處歷史背景的變幻相呼應的，峇峇馬來語翻譯文學等體上出現三個明顯的分期，主要的分水嶺則是在於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所帶來的衝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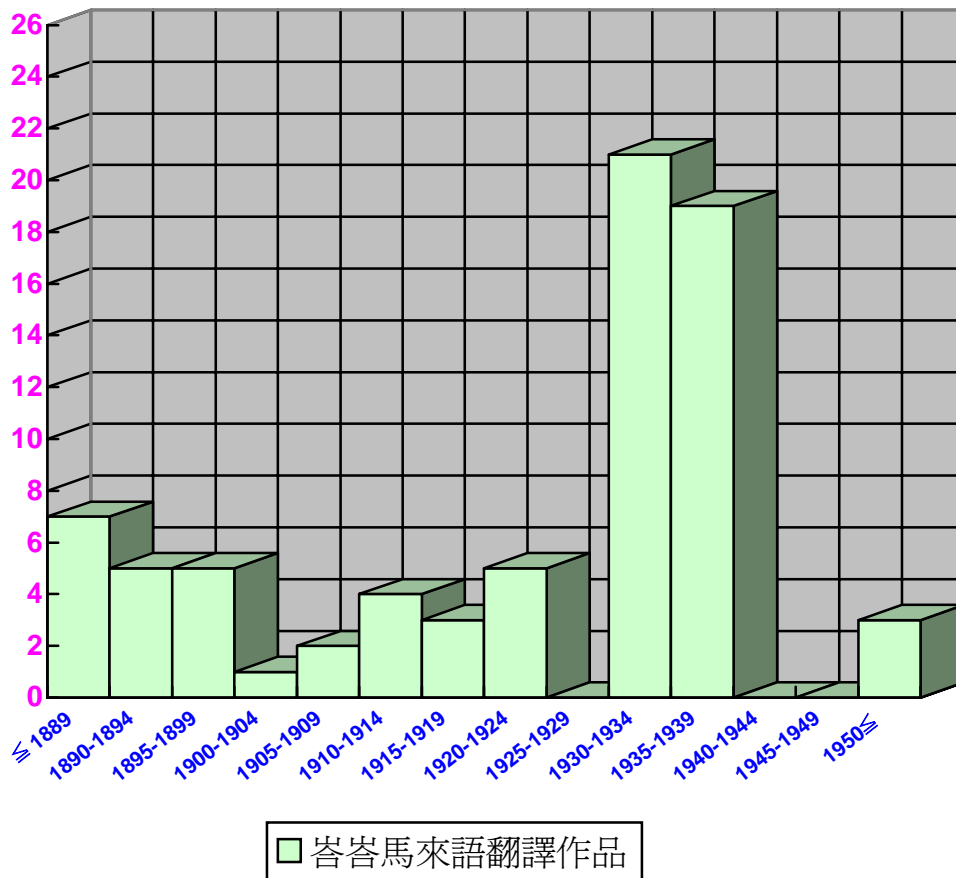
表 2-2：峇峇馬來語翻譯作品統計

階段	年代	數量	備註
第一階段 (40 年：32 部)	≤1889	7	
	1890-1894	5	
	1895-1899	5	
	1900-1904	1	
	1905-1909	2	
	1910-1914	4	
	1915-1919	3	
	1920-1924	5	
	1925-1929	0	
第二階段 (10 年：40 部)	1930-1934	21	曾錦文翻譯作品之再版，不列入統計： 《三國》(1932 再版；1892-1896)； 《西遊》(1933 再版；1911-1913)； 《宋江》(1934 再版；1899-1902)
	1935-1939	19	《孟麗君》(邱平炎於 1934-35 譯，1936 年出版)，因同樣的譯作已算入 1930-1934 期，故這裡不列入計算。
第三階段 (至 1950 年 10 年：1 部；至 1985 年，45 年：3 部)	1940-1944	0	
	1945-1949	0	
	1950≤	3	其中兩本分別為 1963 年、1985 年之譯作。事實上已與峇峇翻譯文學活動(1950 年停止)脫節。

附註：

1. 本表中有些譯本各冊書之出版時間橫跨 1 年以上者，一概以該書最早面市的出版年代為統計依據。
2. 本統計表排除「峇峇翻譯文學作品」(應計：83 部)中 3 部再版、1 部重複(孟麗君)、及 4 部出版狀況(年代)不明者，實計 75 部。

圖 2-I：峇峇馬來語翻譯文學的發展



一、峇峇馬來語翻譯文學的興起（1889~1929）

峇峇的文化是經過長時間的異族通婚及文化交流醞釀出來，同樣的，作為峇峇文化內涵之一的峇峇馬來語翻譯文學也不是憑空蹦出來的。19 世紀末 80 年代在峇峇社會中出現的翻譯作品，是在當代各種主客觀條件相互配合下所衍生出來的產物。因此，在探及峇峇馬來語翻譯文學興起時期的真實情況之前，我們有必要對其因何而起有初步的瞭解。整體而言，峇峇馬來語翻譯文學興起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幾點：

（一）經濟起飛與城市生活中市井階層的形成

1870 年代以後英國殖民者對檳城、新加坡等地大肆開發，帶動了當地的經濟發展，尤其新加坡更是逐漸崛起成為國際性的商港，人口的聚集與工商業的發達，為都市文學的孕育提供有利的前提。此外，在技術面上，印刷術的引進也直接促成了出版業的興旺，19 世紀初始，各種書寫語體的出版品相繼出現，較早的報刊以英語為主，其中有 1806 年創刊於檳榔嶼的《威爾斯王子島公報》（*Government Gazette, Prince of Wales Island*）、1826 年倫敦佈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於馬六甲創辦的《馬六甲觀察報》

(*Malacca Observer*)，以及 1845 年英國人在新加坡創刊的《海峽時報》(*The Straits Times*)⁷，必須強調的是，其本地讀者群除了少數以峇峇為主的知識份子，早期這些英語報章的服務對象多是英國殖民者而非本地人。另外 1870 到 80 年代，又陸續有幾份諸如《本地回教徒》(*Jawi Peranakan: The Moslem Local-Born*)、《晨星》(*Nujunul-Fajar*)、《馬來領域》(*Jalahn Melayu*) 等用爪夷文創刊的馬來文報出現⁸。回觀峇峇社會，在第一本羅馬化峇峇馬來文翻譯作品於 1889 年誕生以前，就已經創辦過三份兼及英語、峇峇馬來文的刊物。這些刊物除了提供空間予峇峇抒發己見外，更重要的是，它落實了峇峇馬來語的書面化。無可否認，馬來語的羅馬化並不是峇峇人的創舉，根據史料記載，最早開始以羅馬字母記錄馬來語的應是早期東來的西方傳教士（見本節第四項），但峇峇創辦峇峇馬來文報刊，確實對馬來文的羅馬化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此外，從第一章的敘述中，我們已經瞭解到，19 世紀末的峇峇社會，其最典型的文化模式已近完形，並且在英國殖民者的維護下，做為大英子民，他們享有許多非峇峇華人所沒有的政治、經濟與教育權利，儼然是新馬社會中最為優越的特殊階層。他們集中生活在海峽殖民地三大都會地區，並且隨著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西方文化的影響，開始培養出閱讀的興趣，尤有進者，經濟條件的寬裕也使峇峇人有錢有閒的去享受市井生活裡不同的娛樂消遣活動，而閱讀的需求也相應增加。然而，從上一節的峇峇報刊雜誌介紹中，我們也知道，19 世紀末絕大部分海峽華人的英文讀寫能力仍非常不足，同樣的，已深度涵化的大部分峇峇亦無法讀懂漢書，加上對現有以爪夷文書寫的「高級馬來語古典文學」也實在「陌生」⁹，種種客觀因素無形中導出了一個非常大的落差，即峇峇社會雖已有了閱讀的迫切需求，但能普遍派得上用場的文學讀物卻異常匱乏。因此，19 世紀末的峇峇社會中已經出現急需以本民族語言書寫並能迅速滿足需求讀物的現象。換言之，這時候峇峇翻譯文學賴以生存的市場已經成形。

（二） 中國通俗文學的流傳與影響

19 世紀 70 年代以後，英國殖民者從中國華南地區引入大量勞工以開發經濟，這些被當地人稱為「新客」的華人，大都是農民或手工業者，其中大都是知識水平不高的文盲，因此他們所接觸和喜聞樂見的文化生活，便是

⁷ 《海峽時報》最早名為《海峽時報與新加坡商業日報》(*The Straits Times and Singapore Journal of Commerce*)，創刊於 1845 年 7 月 15 日，逢星期日不發刊，於 1858 年全面革新為日報，它現今新、馬地區《海峽時報》的前身，是新、馬各語文報業史上歷史最悠久的一份報紙。詳見葉觀仕，《馬新新聞史》（吉隆坡：韓江新聞傳播學院，1996），頁 271。

⁸ 葉觀仕，同上，頁 282。

⁹ 這裡所謂的「陌生」，筆者認為主要在於對「爪夷文」缺乏親切感。根據資料顯示，早期印尼土生華人中有很多懂人得爪夷文，並且根據筆者透過馬來西亞對華、巫交流頗有研究的學者莊華興老師的瞭解，峇峇中不乏認識爪夷文的人，如翻譯家曾錦文便是。但一般上基於宗教問題，峇峇們多不願意書寫這個從阿拉伯字母轉化而成，具有伊斯蘭色彩的文字。

從中國帶來的傳統通俗文化，尤其中國通俗小說和傳統戲劇，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尤其在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 30 年代這段期間，這類通俗文化活動在新馬各地華人圈子中的活絡程度，幾乎可說是盛況空前。在文本方面，早期的華人移民從中國帶來了大量的中國古典小說，包括了《西遊記》、《水滸傳》、《三國演義》、《包公案》等在中國流行的通俗小說，也在新馬各地普遍流傳，當然，19 世紀 80 年代也順水推舟的成了峇峇馬來語文學輕易取得的翻譯材料。此外，中國傳統地方戲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新馬華人社會的影響力更是無遠弗屆，其中以（俗稱）福建戲、廣府戲和潮州戲這三種劇種最為普遍。1887 年到訪新加坡的上海人李鍾珪便記錄了當時粵、潮及閩劇在當地盛行的情況，並指出戲票低廉，下層群眾可以享受，是傳統戲曲在當地華人圈中廣受歡迎的原因之一。他並進一步說：

戲園有男班、有女班。大坡共四五處，小坡一二處，皆演粵劇，間有演潮劇、閩劇等，為彼鄉人往觀之。戲價最賤，每人不過三四占，合銀二三分，並無兩等價目。¹⁰

以新加坡為例，二次世界大戰期間（1918-1939），當地的華人傳統戲曲活動更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繁盛局面，可謂中國戲曲在該地發展的黃金時期¹¹。此外，根據學者黃連枝的分析，在這些地區演出過的傳統劇目，按其主題意義及特點，主要包括以下四大類：¹²

表 2-3：新加坡演出過的中國戲曲劇目

題材分類	劇目
一、宣揚帝王將相的豐功偉業、生活軼事	《正德君遊江南》、《乾龍遊江南》、《六國大封相》、《楊門女將》、《真假三狀元》、《帝女花》、《西國公主》、《包公三勘蝴蝶夢》、《狸貓換太子》、《王宮鳳去》、《劉備招親》、《呂布戲貂蟬》、《一門三進士》、《啞子狀元》、《萬古流芳》、《大明英烈傳》等等。
二、才子佳人的風流韻事和悲歡離合	《昭君出塞》、《西廂記》、《孟麗君》、《梁山伯與祝英台》、《秦香蓮》、《白蛇傳》、《珍珠塔》、《孔雀東南飛》、《黛玉葬花》、《情僧夜訪瀟湘館》、《洛神》、《蘇六娘》、《胭脂井》、《女兒香》、《李三娘》、《陳三五娘》、《春秋美人》、《孟薑女哭倒萬裏長城》等等
三、神奇鬼怪故事	《封神傳》、《八仙過海》等等。
四、爭討「蠻夷」故事	《薛仁貴征東》、《薛丁山征西》、《狄青平西》、《五虎平西》等等

相較於傳統小說，傳統戲劇這類文學形式的娛樂性及接受度更強，也更為普羅大眾所接受，尤其對目不識丁者，包括不識漢文的峇峇華人，戲劇文學無疑是文化生活上更好、更易讀懂的選擇。從以上表來看，我們不難發現，峇峇馬來語翻譯文學所選譯題材及書目，與以上劇目的重疊性是非常高的，於

¹⁰ 李鍾珪，《新加坡風土記》（新加坡：南洋編譯所，1947），頁 12。

¹¹ 賴伯疆，《東南亞華文戲劇概觀》（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93），頁 29, 193-194。

¹² 黃連枝，《馬華社會史導論》（新加坡：萬裏文化企業公司，1971），頁 122-123。

此中國傳統戲劇對於峇峇翻譯文學的影響也就不言而喻了。

此外，我們也不應忽略口頭文學的作用，19世紀末大量華工的湧入，也帶來了承自中國說話藝術的兩類口頭文學，即在日間市場的「講古」及夜市街頭的「勸善」，做為市井生活的一份子，峇峇必然對此類文學有所接觸，以現有匱乏的資料，我們當然無法深入瞭解其影響性到底有多深，但可以肯定的是，「說書」文學的出現必定也帶動了「古冊」（即峇峇翻譯者為吸引讀者或提高自己譯本的價值，經常在譯作序言強調的“Koh Chek”）的廣泛流傳。

（三） 印尼土生華人翻譯文學的影響

印尼土生華人翻譯文學與新馬峇峇翻譯文學之間具有某程度上的連繫，根據筆者蒐集所得的資料，這說法最早出現在峇峇魯白野的〈峇峇的文學〉一文中：

峇峇文學最先發源在十七世紀的爪哇，以後又有坤甸、邦加勿裏洞、馬六甲、檳城等地的峇峇文學產生。¹³

回顧印尼土生華人文學的產生，最早應是從拉丁化爪哇語的中國傳統小說翻譯開始，根據西方學者布蘭德斯（J. Brandes）透露，目前可找到最早作品是1859年出版的爪哇語譯本《李世民》（Li Si Bin）¹⁴。而目前能找到的第一部羅馬化印尼（馬來）文中國傳統小說譯本則是1882年由荷蘭出版商凡·多普（H.M. van Dorp）在巴達維亞出版的*Boekoe tjerita Tjio Koan Tek anak Tjio Boen Giok, terkarang oleh soatoe orang Tjina*（《華人所撰周文玉之子周觀德故事》）¹⁵。從時間推算，印尼土生華人文學的產生比新馬峇峇翻譯文學還早了超過30年，而印尼（馬來）文的漢文小說譯本也比之早5年出現。此外，從1870年代到1960年代近100年的歲月裡，印尼土生華人的馬來文翻譯著作有不下759部（不含重印本），這數量遠遠超過了新馬峇峇的79部譯本，從數據看，我們可以想見當時印尼土生華人翻譯文學的蓬勃。1980年張麗珍在其論文《峇峇華人的譯作——〈乾隆君遊江南〉》中也提出了類似的看法，並列出兩地土生華人皆翻譯過的傳統小說書目，比對兩者的出版時間，她認為除了《三國》，其他的翻譯作品幾乎與印尼的翻譯同時或在其之後翻譯出來，馬來亞的翻譯者在選材上展現出與印尼土生華人相同的品味，這不可能純屬巧合，可能他們的翻譯作品繼承自印尼，而把印尼土生華

¹³ 魯白野，《馬來散記》（新加坡：世界書局，1954），頁54。

¹⁴ J. Brandes, “Lo Tong, een Javaansche reflex van een Chineeschen Ridder-roman”（羅通，中國武俠小說爪哇文版），*Tijdschrift voor Indische Taal-, Land, en Volkenkunde*（印度語言、地理、人類學雜誌），deel XLV, 1902, pp. 263-271. 另見Claudine Salmon, “A Note on Javanese Works Derived From Chinese Fiction”, *Literary migrations : traditional Chinese fiction in Asia (17-20th centuries)* (Beijing : International Culture Pub. Corp., 1987), p. 375.

¹⁵ Claudine Salmon, “Malay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Fiction in Indonesia”, *Literary migrations : traditional Chinese fiction in Asia (17-20th centuries)* (Beijing : International Culture Pub. Corp., 1987), pp. 401-402.

人翻譯作品引進馬來亞的，極可能是在兩地經商的華裔。¹⁶

張氏的說法看似言之成理，卻有需要深入反思的地方。首先，我們不應忽略兩地之間馬來書面語拼音系統不同所造成的隔閡，因此，為何新馬峇峇不乾脆坐享其成，直接閱讀由印尼土生華人翻譯的作品，還要大費周章的自己翻譯，最主要原因便是大部分的新馬峇峇看不懂這些荷式拼音的馬來文。例如峇峇袁文成便曾在譯本《後列國誌》的後記中透露：

我將儘量把本書譯完。假如把它譯成爪哇式的羅馬化馬來文，英屬馬來亞的土生華人沒有幾個看得懂。(筆者譯文)

因此，筆者認為，印尼土生華人的翻譯作品會被引入馬來亞，主要還是為迎合旅居本地經商的印尼籍土生華人，這推理就如同峇峇在新加坡創辦的報紙在印尼同樣設有經銷商一樣，但主要對象卻還是旅居當地的新馬峇峇¹⁷。次之，馬、印兩地之間在翻譯的書目方面，雖然大部分相互重疊，但實際上兩者與流傳當地的漢文通俗文學卻也同時呈現高度重疊的狀況。換言之，當時南流到東南亞的中國通俗小說題材，來來去去就不外乎這些在中國華南已廣泛流傳的通俗故事。故此，我們不能僅因題目的重疊性便認為馬來亞的翻譯文學師承自印尼土生華人的翻譯作品。當然，以現有的資料我們已難考證新馬峇峇各自在翻譯時根據的是漢文原著，還是透過外來的印尼譯本轉譯¹⁸？若硬要尋找答案，或許 1901 年收入《海峽華人雜誌》裡一篇英譯〈封神傳〉下編者的附註可以提供一些線索：

The material for the article were supplied by Mr. Khoo Siok Wan, 'Kujen', to one of the Editors in the form of bare notes, and Mr. Tsao was kind enough to undertake to expend these so as to make them readable and intelligible to those who will never read the Feng Shen Chuan—a work in twenty volumes—in the original.¹⁹

(譯文：這篇文章的材料是由辜肅雲先生提供，最初交到編者手上的是些簡陋的稿子。這本原版有 20 冊的《封神傳》，考慮到那些從未讀過該作品的讀者，這些稿子已經趙先生熱心的將之擴充為較為可讀亦可理解的作品。)

無論如何，印尼土生華人翻譯文學對新馬峇峇翻譯文學直接的影響性到底有多大？我們無法定論，但從印尼翻譯熱潮的掀起早於新馬峇峇，且比之更為蓬勃，加上文化思想上的相近性看，我們確實無法抹殺新馬峇峇間接受到影

¹⁶ 這些書目包括了《薛仁貴征東》、《正德君遊江南》、《七屍八命事》、《鮑自安打播臺》、《杏元小姐》、《萬花樓》、《嶽飛》、《王昭君和番》、《楊文廣征南閩》、《狄青五虎平南》、《瓦岡》、《三國》及《五鼠鬧東京》等。詳見 Teo Lay Teen, *A Study of The Malay Translation of Chinese popular fiction by the Baba Chines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Khian Leong Koon Yew Kang Lam"*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1980), pp. 36-38。

¹⁷ 以《海峽華人雜誌》為例，便經常刊登來自倫敦、檳城、馬六甲及爪哇的讀者來信。筆者曾檢閱其中一封刊於 1907 年 3 月第十一期的爪哇讀者來信，作者本人便是一位出訪巴達維亞的海峽華人。

¹⁸ 在目前能找到的峇峇馬來語翻譯本中，譯者從來沒有對原文本的出處有過任何介紹或附註說明，因此，譯者究竟是根據爪哇譯本轉譯而成？亦或是至皆翻譯原文本？就目前的資料，我們無從知道答案。

¹⁹ 引自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1901, vol. V, Singapore, p. 147。

響的可能性。

(四) 峇峇的教育和語言的轉變

在第一章探討過的英語教育對峇峇語言使用的影響中，我們已瞭解到，英文的引介使峇峇人學會了以羅馬拼音來記錄自己的語言。至少在十九世紀中葉，皈依基督教的峇峇華人已開始懂得閱讀羅馬化馬來文書。在這方面則西方傳教士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例如，約在 1838 年抵達新加坡的傳教士基斯貝利 (B. P. Keasberry)，便曾向文西·阿都拉 (Munshi Abdullah) 學習馬來語，之後並在當地辦學，教導當地人馬來語，直至 1875 年逝世。在傳教期間，他曾用馬來語向他的華人教友傳道，並且用羅馬化馬來文為他們翻譯了幾本小冊子，而這時期的華人，想當然爾就是峇峇華人。另外，英國傳教士查理·菲立普斯 (Mr. Charles Philips, 死於 1904) 在常駐新加坡期間，除了英語，也經常以馬來語進行宗教禮拜儀式，他甚至把大量的英文聖詩譯成馬來文供海峽華人教徒使用²⁰。再來是 1905 年，Rev. W. G. Shellabear 曾用羅馬化馬來文把英國人詹班揚 (John Bunyan) 的基督教名著《天路歷程》(*The Pilgrim's Progress*) 翻譯成《朝聖者的故事》(*Chrita Orang yang Chari Slamet*)²¹。19 世紀末以降，西方傳教士在對峇峇人傳教時，馬來語使用率的頻繁，說明瞭直到 20 世紀初，除了少數優越階級，大部分峇峇華人尤其婦女，都只會講峇峇馬來語，而傳教士羅馬化馬來語的嘗試或多或少也對其峇峇教友帶來語言文字化的啟發。

此外，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可說是峇峇語言使用上各語言相互較勁的時代，在本民族的峇峇馬來語之外，部分峇峇因方音漢字的私塾教育啟蒙，延續了峇峇人尤其福建話的能力，與此同時又面對外來英語的強力介入，這樣的多語環境無形中為峇峇社會培養出不少雙語甚至如曾錦文這類的三語人才，當然，這些人材正是峇峇翻譯文學得以產生的契機。

(五) 峇峇本身對中華文化的仰慕

這個因素是許多中國學者經常予以高度強調的，根據對峇峇社會背景的瞭解，這確實有推波助瀾的作用，但並不是峇峇翻譯文學得以產生的唯一因素。峇峇在語言及部分生活習慣上已被馬來文化涵化，在政治認同上也趨向英國主流，然而，由於長期秉持中國文化傳統，加上大部分同時認同於「華族」的身份，因此，峇峇文化發展至 19 世紀晚期雖已另闢蹊徑，但基本上，他們對「中華文化」仍是心往神馳的。

²⁰ 參見克勞婷·蘇爾夢，〈馬來亞華人的馬來語翻譯及創作初探〉，《中國傳統小說在亞洲》(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9)，頁 331；宋旺相，《新加坡華人百年史》(新加坡：中華總商會，1993)，頁 50。

²¹ Tan Chee Beng, "Baba Chinese Publication in Romanized Malay",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No. 22 (Tokyo: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Asia and Africa, 1981), p. 168。

首先，就在地研究方面，張麗珍便指出《海峽華人雜誌》曾大幅的介紹過中國古典文學，證明峇峇對中國（古典文學）是興致勃勃的。此外，林文慶除了積極在《海峽華人雜誌》裡介紹儒家思想外（見表 2-4，在與中國文學相關的 16 篇文章中，林氏撰寫的七篇儒家相關文章就佔了將近一半）。在〈我們的敵人〉（“Our Enemies”）一文中他也予以中國古典文學高度的肯定，且認為中國古典文學具有兩大優點：一、有利於峇峇在馬來環境中維持本質的完善。二、它是提高個人情操及淨化品德的重要元素。

表 2-4：《海峽華人雜誌》（*Straits Chinese Magazine*）中與中國文學有關的作品²²

文章	相關內容	作者 / 譯者	刊載時間
“Some Genuine Chinese Authors”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莊子思想： 'An extract from Chuang-tzu, Mystic, Moralist and Social Reform' (translated by H. A. Giles) ➢ 'The Reply of Li Ling to Su Wu' (李陵答蘇武書) ➢ 詩歌：黃鵠歌 (Wang Gu Ge or 'The Chant of Yellow Stork') ➢ 詩歌：班婕妤(Ban Jieyu, 漢朝 Han Dynasty)，秋扇歌 (Qiu Shan Ge or 'Autumn Fan') ➢ 詩歌：曹子建 (Cao Zijian, 三國時期)，七步成詩 (Qi Bu Cheng Shi or 'The Seven-paced Poet') ➢ 詩歌：王維的唐詩(兩首) ➢ 韓文公 (Han Wengong) 的散文 (唐朝) 	Tan Teck Soon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1897, Vol. I, pp. 63-68 ➢ 同上, pp. 95-99 ➢ 同上, p. 96 ➢ 同上, pp. 136-141 ➢ 同上 ➢ 同上 ➢ 同上
What the orange seller says 「賣柑者言」(譯述)	《賣柑者言》，元末明初劉伯溫所著。	不詳	1898, Vol. II, pp.18-19
The Wars of the Gods (Being A Short Account of the "Feng Shen Chuan")	《封神傳》翻譯	P.C. Tsao	1901, Vol. V, pp. 147-151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1 - Kung Chi Chi's Protest (譯述：《左傳：宮之奇諫假道》)	《左傳》節譯	Lim Boon Keng	1901, Vol. V, pp. 66-79,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中國文學與哲學	K. T. T.	1901, Vol. V, pp.108-111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 - Chia Chi Tui's Modesty (譯述：《左傳：介之推不言祿》)	《左傳》節譯	Lim Boon Keng	S.C.M., 1901, Vol. V, pp. .96-102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3 - Chi Wen Tzu's Condemnation of P'u (From the Tso Chuan) (譯述：《左	《左傳》節譯	Lim Boon Keng	S.C.M., 1902, Vol. VI, pp. 30-35

²² 本表由以下資料整理而成：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1897-1907; Teo Lay Teen, *A Study of The Malay Translation of Chinese popular fiction by the Baba Chines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Khian Leong Koon Yew Kang Lam"*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1980), pp. 30-32。

傳》：〈季文子論出莒僕篇〉)			
Anecdotes From The Records of Famous Women: "The Ancient Records of Famous Women" (古列女傳)	《古列女傳》節譯	Lim Meng Ch'in (林文慶筆名)	1903, Vol. VII, pp.132-133; 1904, Vol. VIII, pp.38-39, 94-96, 142-144, 188-190; 1905, March, Vol. IX, No. 1, pp.26-28
Confucian Cosmogony and Theism	儒家思想	Lim Boon Keng	1904, June, Vol. 8, No. 2
The Basic of Confucian Ethics	儒家思想	Lim Boon Keng	1904, Dec, Vol. 8, No.4
The Confucian Code of Filial Piety: 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The aim of Filial Piety is in the first place to serve one's parents, then to serve one's sovereign, and lastly to establish one's own self." <i>The Classic of Filial Piety</i>	儒家思想：孝道	Lim Boon Keng	1905, March, Vol. IX, No. 1, pp.12-18
The Confucian Cult.: 「夫祭者非物自外至也自中出者生於心也。」 "Sacrifice does not come to us from without but arises from the heart within us." <i>The Li Ki</i>	《禮記》摘譯	Lim Boon Keng	1905, June, Vol. IX, No. 2, pp.73-78
The Confucian ideal	儒家思想	Lim Boon Keng	1905, Sept., Vol. IX, No. 3, pp.115-119
The Confucian Doctrine of Brotherly Love: "Nulla via major pietate verâest" _seneca	儒家思想	Lim Boon Keng	1905, Dec., Vol. IX, No. 4, pp.169-173
The Confucian Code of Conjugal Harmony	儒家思想	Lim Boon Keng	1907, March, Vol. XI, No.1, pp.24-27
The Confucian Ethics of Friendship	儒家思想	Lim Boon Keng	1907, June, Vol. 11, No. 2

從表 2-4 看來，這份西化色彩濃厚的峇峇雜誌，幾乎每一年每一期都有至少一個篇章用以介紹或譯述中國文學作品。其中又以 1897 年第一期中陳德順 (Tan Teck Soon) 撰寫的 “Some Genuine Chinese Authors” 對中國文學的著墨最深，也較具文學性，他不僅介紹了莊子思想，也譯述了幾首中國古典詩歌，諸如《黃鵠歌》、《秋扇歌》等，仔細瞭解這些作品的背景，這些作品往往具有民族接觸、流放他鄉的味道²³。以《黃鵠歌》為例，便是表達了西漢細君公主遠嫁烏孫後去國思鄉的寂寥情感：

²³ 陳德順 (Tan Teck Soon)，宋旺相稱他為「華人民俗家」，1859 年出生於新加坡，受英語教育，也曾赴廈門攻讀漢學。詳見宋旺相，《新加坡華人百年史》[中譯本]（新加坡：新加坡中華總商會，1993 版），頁 79。

英譯文（摘自《海峽華人雜誌》）	原文 ²⁴
My family had married me out, into this corner of the world. I was sent to this far off land, to be wife of the Wusun Prince. I have a tent for my walls; I have meat for my food. And mare's milk for my drink. I have dwelt her, O! So long, that my heart is sad within me O! That I were you yellow stork, how soon would I fly back to my home?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 遠托異國兮烏孫王。 穹廬爲室兮旃爲牆， 以肉爲食兮酪爲漿。 居常土思兮心內傷， 願爲黃鵠還故鄉。

在翻譯《黃鵠歌》時，陳氏便說道：

“I shall therefore select first a short poem by a Chinese Princess, expressing a sentiment as world wide as humanity itself, to which we as exiles in this far-away land could safely respond and heartily sympathise.”

（簡譯：我將首先選取這首中國公主的短詩，藉以表達那份最易引起我們這些流亡遠方的人共鳴和衷心悲憐的那份人類普同的情感。）

從這些作品看，這似乎應驗了中國學者莫嘉麗的推斷：「中國古典小說，對土生華人而言，恰恰是他們瞭解遙遠而親切的祖宗之國，一解鄉愁的媒介。」²⁵然而，事實真是如此嗎？

我們再來看看早期峇峇馬來文的中國通俗小說翻譯作品。在翻閱哪些中國通俗小說翻譯作品時，我們會發現，一些翻譯家常在其前言或廣告中強調，其翻譯作品是「摘自古冊」（*turun-kan dari Koh Chek*），其中舉例如下：

...ini chrita dulu kala ber-nama Ngo Ho Peng Lam; chrita dari asal Teck Cheng prang tak kala Song Jin Chong dapat manjadi Rajah. Krana kan banyak Sobat Sobat ada mintak sama kita suru bikin ini chrita keluar, jadi itu kita suda turun kan ini chrita dari Koh Chek China.²⁶

（譯文：這個故事是《五虎平南》，述說狄青打勝仗，而後宋仁宗成帝的故事。循眾要求，我們已經把故事從中國古冊（Koh Chek）摘譯下來。）

...ini chrita dulu kala bernama *Wakang* atau *Chap Puek Loh Huan Ong*, blom perna lagi siapa-siapa pon dalam **Tanah ayer** British Malaya salin-kan punya chrita dulu-kala,

²⁴ 《黃鵠歌》，也稱《烏孫公主歌》，這首詩是細君公主在烏孫時採用其故鄉（揚州江都）的楚歌詩體所作。根據《漢書·西域傳》記載：「武帝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以妻烏孫王昆莫。公主至其國，自治宮室居，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乃自作歌。」（參見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二十五史》，新教本漢書，<http://www.sinica.edu.tw>，2003/12/25 瀏覽。）從內容、文體及創作背景看，都別具非漢的「民族色彩」。

²⁵ 莫嘉麗，〈「種族、環境、時代」：中國通俗文學在東南亞土生華人中傳播的重要原因〉，載於《暨南學報》，第21卷，第2期，1999，頁18。

²⁶ 引自Siow Hay Yam, *Ini Chrita Dulu Kala dari Zaman Song Teow* 宋朝 *Bernama Teck Cheng Ngo Ho Peng Lam* 狄青五虎平南 (*Lima Harimo Pergi Pukol di Negri S'bla S'latan*) , Vol. 1: preface (Singapore: Chinese Directory & Press, 1922).

smua-nya sudah di salin-kan trus deri Koh-Chek, bukan-nya copy-copy deri buku Java Romanised Malay...²⁷

(譯文：這個名叫《瓦崗》或《十八路反王》的故事，在本國英屬馬來亞還不曾有人把它從故事書或古冊抄譯下來。我所出版的故事書，全都是直接抄譯自「古冊」，而不是複製自爪哇的羅馬化馬來語（故事）書。)

...kita jamin, yang apa kita sudah turun-kan dari buku Koh Chek, sudah di turun-kan dengan chukop lengkap...²⁸

(譯文：我們保證，我們從古冊所摘譯下來的（故事），已夠完整。)

Ini chrita dulu-kala bernama *Say-Han* (Low Pang bukak negri dan mulai diri-kan kerajaan Han Tiow) blom perna lagi, siapa-siapa dalam Tanah-ayer British Malaya dan Java salin-kan deri buku Koh Chek dalam bhasa Romanised-Melayu Baba-baba Pranakan...²⁹

(譯文：《西漢》這個故事在英屬馬來亞本土及爪哇，還沒有任何人曾把它從古冊抄譯成羅馬化峇峇馬來文。)

張麗珍認為，這些從中國「古冊」翻譯而成的作品很容易吸引（峇峇）讀者的注意，也因此中國通俗小說翻譯本很快便獲得峇峇社會的支持。只是，這樣的論斷似乎下得太快了，也無法探觸到這些中國通俗小說翻譯作品何以會被接受？又何以峇峇們特別「講究」翻譯源頭等等問題。張氏的解說只告訴了我們峇峇對翻譯作品的來歷有「要求」，但是這還不足以直接反映出問題核心，即「峇峇為何會有翻譯和閱讀中國通俗文學作品的『需求』？」從市場供需的概念出發，既然有中國通俗文學翻譯作品的供應，則必然是由於峇峇社會間有這樣的需求，前文所引莫嘉麗的「親近感」見解，正好可以呼應這個推論。³⁰

²⁷ 引自Wan Boon Seng, *Chrita Dulu-kala Bernama Wakang 瓦崗 atau Chap Puek Loh Huan Ong 十八路反王 di Zaman Swee Tiow, Swee Yam Tay 隋煬帝 Menjadi Hangtay*, Vol. 1: preface (Singapore: Wan Boon Seng, 1931).

²⁸ 引自Wan Boon Seng, *Chrita Dulu-kala Bernama It Ki Mui 一枝梅 atau Chit Kiam Chap Sah Kiap 七劍十三俠 di Zaman Beng Tiow 明朝, Tempu Cheng Tek Koon 正德君 Jadi Hongtay*, Vol. 1: ketrangan (Singapore: Pranakan Book Company, 1936).

²⁹ 引自Wan Boon Seng, *Chrita Dulu-kala Bernama Say Han 西漢 Mulaian Zaman Han Tiow (Han Koh Cho Low Pang 漢高祖劉邦 Bukak Negri)*, Vol. 1: preface (Singapore: Wan Boon Seng, 1931).

³⁰ 參見莫嘉麗，〈種族、環境、時代：中國通俗文學在東南亞土生華人中傳播的重要原因〉，載於《暨南學報》，第21卷，第2期，1999，頁17-18。莫嘉麗的說法廣泛被許多中國學者的採納，但其實莫氏的行文中也隱藏了一些「不明就理」的陷阱。例如，莫氏用了一個現象來證明「土生華人群落」的這份「親近感」：「例如馬華互譯交流的早期，新移民出于維持生計的需要，編著了多類華、馬雙語辭典，而未有將豐富的馬來亞古典文學譯為中文；而土生華人，在當時由於享受到種種政策優惠，成為經濟領域的寵兒而衣食無憂，轉而尋求精神糧食。其主要手段，就是以馬來文大量翻譯中國文學作品，以滿足精神需求。」針對前面「未有將豐富的馬來亞古典文學譯為中文」的說法，這情形確實存在，但問題根源不在「親近感」，而是在語言的隔閡。這些新客華人所編的辭典，其語言基礎是「通俗馬來語」，語言工具書的編纂是為了迎合華人學習馬來

回顧峇峇的過去，峇峇文化是從馬來世界中醞釀出來的，然而，同時演進的馬來文化伊斯蘭化的情況，也造成了兩者間的阻隔，無法有更進一步的親近。而 19 世紀以後擁抱西方文化的情況，也只發生在部分峇峇人身上。對於多數的峇峇來說，儘管在國籍上認同於英國和馬來亞本土（*tanah ayer*），但在文化歸屬感上，他們對承自父系的傳統中華文化始終抱持高度認同的態度，而這種氛圍的繼承，主要還是來自於峇峇的家庭教育。我們知道，峇峇非常重視中國文化中「家族」、「孝道」等概念，早期家族祖孫同堂也很普遍，除了長輩們的身教之外，早期的峇峇父母也讓孩子在進英式學堂之餘，接受華人的私塾教育。因此，孩子所接受到以中華傳統文化為主的家庭教育，可說是非常完整的。出身馬六甲峇峇家庭的蔡女士在接受筆者訪談時曾說：

Baba Nyonya……也是中國人[zhong guo' re'n, 按：意指華人]，所以一路來，妳要知道，我們中國人來，他…兩夫婦，那個中國人是丈夫，所以以前的男人，他們一定要他們的tradition那些東西保留下來，一定要保留下來！好像拜神啊那些東西，一定要跟著的。所以妳看Peranakan Cina的家，他們的家庭中哪些拜的東西通通很完整，跟著我們Chinese的style。不過如果妳回去中國，妳看不到這些東西，為甚麼？因為他們來那時候是早時來的，沒有換過這些Cultural Revolution（文化改革）那些東西，所以我們中國人的習慣已經換了，不過我們以前來到這邊的中國人的習慣沒有換到，因為change of government那些，葡萄牙啊那些人，通通沒有影響到我們中國人的culture，我們的culture能保留到現在，就是這樣的原因。……[拜神？]拜最多的是關公跟觀音，媽祖也是有……」³¹

延此推論，我們可以瞭解到：一、在中華文化的秉持上，峇峇人比後來的新中國移民更傳統，若從 16、17 世紀的文化背景計算，峇峇的文化是直接承自迄至明朝以前的中華文化，而非華北（中原）文化逐漸滲透後而逐漸走向精緻化、規範化的「中國文化」，因此在選擇上，他們對自古即在民間廣泛流傳的中國俗文化有更直接的喜好。二、也因為這份古早的文化維繫，峇峇人對於中國傳統（民俗）文化的親近感，相對於新客華人是更為投入的，而不是外人刻板印象中人的「因番化而疏離」。無可否認，直到 20 世紀初，許多峇峇人因「西化」而開始有與中華文化疏離的現象，然而也因此，許多年長的峇峇開始有道德淪亡、背祖忘宗的危機意識³²，而更堅持為孩子灌輸中國傳統文化思想，而中國通俗小說翻譯本，便是最好的教

語會話的需求，這有別於用以書寫馬來古典文學的「高級馬來語」，因此在語言的掌握能力上，加上不識爪夷文，新客華人不見得能讀懂馬來古典文學作品，更何況是高難度的翻譯工作？回觀馬來語能力較強的峇峇，能讀寫爪夷文的峇峇雖不乏其人，但要普遍大眾閱讀高級馬來（爪夷）文章，這著實有點強人所難。

³¹ 2003 年 3 月 17 日，馬六甲田野訪查記錄。地點：青雲亭，受訪者：蔡女士，為馬六甲著名歷史人物蔡士璋的後代。

³² 針對這些危機感，19 世紀末的尤林文慶等人所掀起的「海峽華人改革運動」便是最好的註腳。在主張剪小辮子、解放婦女纏小腳等陋俗的同時，峇峇領袖們也高度推崇儒家思想、並強調仁、義、禮、智、孝道等道德觀念的重要性。

科書。他不僅讓對中國文學逐漸陌生的峇峇可以重新接軌，更是峇峇在商場上長袖善舞可以借鑑的「兵書」。

總的而言，這些引文著實為我們釐清了一個疑問：即馬來亞的峇峇馬來語翻譯文學與印尼土生華人馬來語翻譯文學之間，確實存在一定的連帶關係；惟這些敘述同時也證實了一點：即在實際的翻譯工作上，印尼土生華人翻譯文學對馬來亞峇峇馬來文翻譯文學的影響性不如想像中大，因新馬峇峇對「直接抄譯自古冊」的講究，令他們在翻譯時更傾向於直接引譯漢文原本，而非間接轉譯自印尼文本。進而言之，古冊的講究凸顯了峇峇想要閱讀中國古書的慾望，並且他們要求的是一種更直接、更親近的接觸，而這慾望，正是來自於他們本身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歸屬感與嚮往。

環視 1889 至 1929 年之間的峇峇馬來文翻譯文學概況，雖然由於年代的久遠及資料的散軼，我們無法確實掌握峇峇華人的創譯與出版工作始於何時，但就現在所能追蹤到的峇峇馬來文翻譯作品看（見附錄 2），在 1889 年出現的七部譯作，或許就是峇峇翻譯文學的開始，這其中包括六部中國通俗小說及一部民間故事翻譯作品。其中，《杏元小姐與梅良玉》、《雷峰塔》、《雜說傳——今古奇觀與聊齋》、《鳳嬌與李旦》是由陳明德（Tan Beng Teck）所翻譯，而《忠節義、賣油郎（合集）》及《三國故事薈萃》則由石瑞隆（Chek Swee Liong）和平瑞公司（Peng Swee & Co.）合譯。另外唯一的一本民間故事《憨女婿》則由Lye Kam Lim所譯³³，這本峇峇馬來語譯本，根據筆者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圖書館找到的影印本，此書內文收錄了 6 篇短篇故事，都是敘述妻子戲弄丈夫的故事，並附有插圖，其間穿插了一些班頓詩，從內容用詞看，詩歌應是譯者的創作，而非翻譯。值得注意的是《憨女婿》譯本，這書並沒有找到原著，惟筆者卻於《大甲鎮閩南語故事集第一集》一書中，找到了主題相同，內容形似的故事。該故事集乃由胡萬川所主持的「台灣地區民間文學調查、採集、整理、研究」計畫於台中大甲鎮採集而得的口述民間故事³⁴。由此看來，這故事極可能是廣泛流傳於Holo人民間的傳說故事，因相同的故事及原型，不僅在台灣民間流傳，它甚至南流到東南亞的華人社會中。

1890 年到 1899 年十年之間則出現了十部翻譯作品，平均每年一部。1890 年只有一本譯作，即由林福志（Lim Hock Chee）翻譯的《萬花樓》。1891 年除了有黃介石（Wee Kay Seck）翻譯的《岳飛的故事》，著名的峇峇翻譯家曾錦文（曾錦文）也在朋友謝子佑（Cheah Choo Yew）及陳謙福（Tan Kheam Hock）兩位朋有的協助下，以峇抵彥東（Batu Gantong）為筆名，開始自陳明德手上接下《反唐演義》第 4 卷以後的翻譯工作，並於 1892 年開始重譯前三卷，同年也開始了《三國》的翻譯，直到 1896 年。1895 年吳連柱（Goh Len Joo）翻譯了《薛仁貴征東》，此後三年並沒有任何新的翻譯作品出版。1899 曾錦文開始翻譯《水滸》，

³³ 「憨女婿」，即「憨女婿」之意，峇峇譯者以Holo音將之直譯為Gong Kiah Sie（《憨女婿》），為保持原味，本論文行文間，筆者將保留《憨女婿》之名，而不取用「憨女婿」一詞。

³⁴ 胡萬川、黃晴文主編，《大甲鎮閩南語故事及第一集》（豐原：台中縣立文化中心，1995）。

同年馮德潤 (Pang Teck Joon) 分別翻譯了《秦雪梅》及續集《秦世美》，另外還有一部譯者不詳的宗教性作品《立願寶鑒》，根據書名推測，原文應是一本佛書。

邁入 20 世紀，也隔了近五年，1904 年才有新的翻譯作品出版，即 Lau Say 翻譯之《孫龐演義》。相較於 19 世紀末出版的作品，從 1904 至 1924 年這段期間，峇峇馬來語翻譯作品的出版雖沒有像 1890 年代般集中，以每五年的間隔期來計算，其出版量雖不多，卻呈現一種持平的狀況。步入 20 年代，峇峇馬來語翻譯作品的出版事業開始出現蕭條的跡象，20 年代前期仍有四部作品出現，其中包括了《薛仁貴征西》(1921 年)、《薛仁貴征東》(1922)、《狄青五虎平南》(1922) 及《雷峰塔》(1924)，分別由蕭海炎 (Siow Hay Yam) 及蕭欽山 (Soew Chin San) 所譯³⁵。1925 年開始，峇峇馬來語翻譯文學的出版業步入了將近 6 年的停滯期，直至 1931 年，完全沒有任何譯作出現。考量當時的歷史背景，這一階段峇峇馬來文翻譯文學的工作，從 1889 年興起到 1929 年呈現逐漸滑落的趨勢，主要轉折點應是由於 1914 年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尤其戰爭所引發的經濟大蕭條效應，直接衝擊了仰賴商港貿易的海峽殖民地，必然也波及峇峇社會，不管是翻譯工作者、出版商或從讀者反應看，1920 年代後的翻譯出版業越顯低迷。

二、峇峇馬來語翻譯文學的繁盛 (1930~1939)

步入 1930 年代，峇峇馬來語翻譯文學開始復甦，在有系統翻譯及參與人數增多的情況下，甚至出現了令人驚喜的「大躍進」，把峇峇馬來語翻譯文學推向顛峰。從 1930 年到 1940 年短短十年之間出版了共 40 部作品，並再版曾錦文在峇峇翻譯文學興起時期翻譯過的三部作品 (見表 2-2)。

在這段時間裡，一些峇峇開始有意識的發展新聞及文學事業。以翻譯工作而言，開始有人專門從事翻譯工作，並將譯文出售給出版商，例如黃振益 (Wee Chin Ek)，便把他的翻譯作品出賣給林榮和公司 (Lim Eng Ho Co.)。此外，1930 年代開始，峇峇馬來語翻譯工作出現了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即翻譯工作的進行不再像前期一樣，從頭到腳都由譯者一個人扛，而是以合作翻譯的形式，如蕭欽山 (漢文和峇峇馬來文翻譯) 與蕭丕圖 (Seow Phi Tor，負責漢文翻譯) 的組合 (見附錄 2 書目第 40、42 項)，又或一個峇峇馬來文撰寫者，手下除了一位助理外，也兼有一位專門負責閱讀並漢文著作的口述者，例如：李成寶 (Lee Seng Poh) 與助手林振才 (Lim Chin Chye) 以及漢文閱讀者陳友益 (Tan Yew Aik) 的合作便是如此 (見附錄 2 書目第 53、57 項)。換言之，翻譯工作在 30 年代以更有條理的分工形式進行，雖然這暗示了峇峇知識份子「漢語」能力 (尤其在讀寫方面) 的下降，必須仰賴一位能閱讀漢文本的助手讀述，然而，這樣的分工無形中也加遽了

³⁵ 《薛仁貴征西》及《薛仁貴征東》的譯本上並未註明翻譯者姓名。《薛仁貴征西》譯本，根據 Claudine Salmon 的列表，譯者寫明為蕭海炎 (Siow Hay Yam)，但根據 1924 年 2 月 22 日的《日常報》(Kabar Stalu) 報載，此書譯者為蕭欽山 (Soew Chin San)，故本論文取用後者。而《薛仁貴征東》譯本從出版社、行文的拼音習慣看，極有可能是蕭海炎或蕭欽山所譯。

整個翻譯工作的步伐。

三、峇峇馬來語翻譯文學的沒落（1940~1950）

相較於 30 年代的盛況空前，40 年代的峇峇馬來文翻譯事業的發展，幾乎可以「慘淡收場」這句話來形容，十年中直到 1950 年，才有唯一一部袁由文成翻譯的《牡丹公主》（或稱《三寶劍》，共 6 冊，見附錄 2，書目第 77 項）出版，此後雖有黃慶福及 Felix Chia 分別於 1963 年及 1985 年嘗試以峇峇馬來文翻譯過《三伯英台詩》（*Sha'er San Pek Eng Tai*）及《三伯英台》（*Sam Pek Eng Tai*）劇本，然而基本上，1950 年可以說已經是整個峇峇馬來語翻譯文學發展的終結。對峇峇馬來語翻譯作品接觸頗多的楊貴誼曾回憶道：

50 年代期間，本地的一些小販攤上，或舊書店裡，還可零星見到此類出版物在那裡擺賣……我真正接觸到此類出版物，應該是在 60 年代初期。那時我在印尼深造，偶爾在椰加達街頭的舊書攤上買到一些諸如《西遊記》、《薛仁貴征東》……等的印尼文翻譯作品。從閱讀中才領悟到，過去在新加坡街頭見到的同類讀物，原來是馬華翻譯文學的珍品。回新後……時過境遷，再也見不到那些文學遺產的蹤影。³⁶

環視整個峇峇社會的歷史發展，峇峇馬來語翻譯文學到 40 年代之所以會沒落得如此迅速，主要癥結可以從以下幾點瞭解：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不僅重挫馬來亞的經濟，1942 年至 1945 年日本的佔領馬來亞，也摧毀了峇峇社會的生活。日據期間，日本政府透過軍政監部下的教育科，推行「日語（文）」教育及日本化教育，打壓其他語言的教學³⁷。在民族政策上，則推行「親馬惡華」政策，對馬來人採取緩和及籠絡的態度，對華人及印度人則施以鎮壓與屠殺。在段黯淡的歲月裡，許多峇峇因戰爭而家道中落，四處離散，在已自身難保的情況下，實在也沒多餘的閒情去翻譯或閱讀中國通俗文學作品。更何況，以當時日本政府「親巫惡華」的態度，有華人底子的峇峇人實在也不敢過於強調本身的「中華文化」色彩。

在談及關於峇峇馬來文翻譯小說時，蔡女士曾告訴筆者：

以前這些書是很普遍的，不僅僅是一本一本書，也有在雜誌連載，這是我爸爸跟我講的，我也是沒有看過，他的他放在舊家，他們通通丟掉了，所以我自己本身都沒有看過這樣的雜誌，不過那些峇峇人的屋子，一定是還有的啦！只是他們有的收起來，不要跟我們講吧了！……我們要知道，為甚麼叫Baba Nyonya？因為他們一直叫（我們）Baba Nyonya，但現在很多人都忘記其實我們是中國人，也是華人來的……

³⁶ 楊貴誼，〈峇峇翻譯文學系列之二：馬來文版的中國古典文學〉，《資料與研究》第 18 期（吉隆坡：華社研究中心，1995），頁 91-92。

³⁷ 鄭良樹，《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展史》（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教師總會，1999），頁 415-416。

以前我小時候有講是峇峇人啦，因為我們不會講中文……³⁸

從這段話中我們瞭解到，峇峇社會在政經上的優勢地位因戰爭的打擊而動搖，戰後各族民族主義的抬頭，也令融合華巫文化的峇峇人變得「裡外不是人」，在 1980 年代峇峇文化復興運動掀起前的幾十年歲月裡，峇峇人長期處在一種對本身民族文化生活不自覺的壓抑，在民族意識的認知上極度迷惘的狀態中。再加上峇峇社會網絡因戰爭的衝擊而瓦解，很多人在不斷搬遷中便丟失了前人所累積下來的文學成果，而文學工作的繼承也就在這樣的動亂中斷裂。

(二) 教育政策與語言使用的改變

多語的能力是峇峇的優勢，但長期處在各種民族語言相互消長的環境裡，這其實也是令峇峇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常常陷入無所適從窘境的重要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英國殖民者爲了鞏固自己在馬來亞的統治勢力，加強執行英語教育政策，而新馬兩國獨立後，前者重英語，後者推標準馬來語的教育政策，也迫使兩地峇峇必須選擇走向英語或馬來語更標準化的兩個極端道路。這使普遍上接受英語教育的峇峇更傾向於英語的接收與使用，他們其中很多人雖仍會峇峇馬來語，但基本上對馬來文的學習與鑽研不感興趣，接受過正統馬來語文教育的年輕一輩，更是瞧不起通俗、混雜的峇峇馬來語。而中文也因常被新華人移民羞辱，很多峇峇憤而與之背道而馳，即便現在許多峇峇開始接受中文教育，但同時間他們的峇峇馬來語（文）能力卻已經所剩無幾。語文讀寫能力的趨向英文單一化，也造成戰後新一代的峇峇中嚴重缺乏具備多語的翻譯人才。此外，西化的教育、英語至上的社會環境，也徹底改變了峇峇人的閱讀習慣，年輕一輩喜於閱讀英語文學作品，對祖先遺留下來的翻譯作品，除了帶有「落伍」、「低俗」的認知外，在地化的教育及轉語現象，使年輕一輩的峇峇對「中華文化」已不抱過多的「遐想」，哪份「親切感」相對於老一輩峇峇的而言，已經越見疏遠。

(三) 對峇峇馬來語（文）缺乏根本性的鑽研

在印尼，土生華人早在 1884 年就出版了第一部用印尼（馬來）文書寫的語法書——《巴達維雅馬來語》，該書作者李金福（Lie Kim Hock, 1853-1912），出生於西瓜哇，受過師塾教育，也曾隨荷人補習荷文，並且靠自修累積了深厚的馬來文根底。除了爲當地馬來文報章撰寫新聞稿，他也以馬來文翻譯和創作了近二十五部作品，更重要的是，他不但身體力行以寫作來提倡土生華人馬來文，也不斷嘗試給該語文制定一套合理的法則，其書寫文筆甚至影響了後來的土生華人作家。³⁹

³⁸ 2003 年 3 月 17 日，馬六甲田野訪查記錄。地點：青雲亭，受訪者：蔡女士。

³⁹ 參見廖建裕，〈印尼土生華人文學初探〉，《亞洲文化》第五期（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1985），

反觀新、馬的峇峇人，他們所使用的混雜式馬來語雖然被視為不夠標準，但在強烈依靠地方語言維持社交活動的時代裡，尤其在和馬來民族溝通時，便不得動用通俗馬來語來充當溝通媒介，這比起完全沒有馬來語知識基礎的新客華人，則又略勝一籌。可惜的是，處在這種先天條件的優勢下，偏安於海峽殖民地城市生活的峇峇們，似乎忽略了對本民族語言的鑽研與整理，致使峇峇馬來語更多時候停留在口頭傳承的階段，並沒有出現一些因時因地制宜的革新。峇峇人掌握馬來語的時間不算短，峇峇馬來語翻譯文學的發展也延續了好一段時間，然而時至今日，針對峇峇馬來語所做的蒐集和研究仍是非常缺乏，也不曾出現類似峇峇馬來語辭典的語言工具書。雖然近年，峇峇魏添福有出版過一本《足金：峇峇話精粹》，而Anne Pakir等人也開始研究峇峇馬來語，但這已經是峇峇馬來語沒落後、已欲振乏力的80、90年代⁴⁰。

（四） 峇峇馬來語出版業與市場的侷限性

首先，從峇峇馬來語翻譯文學的閱讀對象看，主攻的還是通曉峇峇馬來語的峇峇人。曾錦文曾在他的《三國》序文裡提到，他從事這項翻譯工作，主要是為他的「族群」提供有益的消遣讀物，此外，也希望透過這些翻譯作品，讓那些不懂漢文的峇峇、娘惹們對中國文學名著有所認識。以讀者的接受能力來看，要讀峇峇馬來語翻譯文學則至少要具備「峇峇馬來語」能力，而由於峇峇馬來語主要是馬來語和 Holo 語的結合，加上由於翻譯的材料是中國通俗文學作品，自然的翻譯時所使用的「漢字方音」詞彙會相應增加。因此，這類翻譯作品對當時仍習慣於閱讀標準馬來語爪夷文體的馬來人來說，接受度不高。而20世紀初不斷增長的西化峇峇，也未能廣泛接受這類作品，甚至對它的評價並不高，例如陳德順在〈幾位真正的華人作家〉一文中便說：

在海峽華人當中，最近出現了一種新的文學，即用羅馬化馬來語翻譯的中國優秀小說……作為華人文學成就的代表……這些譯本是完全不夠的。我也不相信譯者會要求讀者給他們以高度的評價。⁴¹（筆者譯文）

因此，峇峇翻譯文學單靠峇峇與娘惹這批極有限人數與購買力換來的經濟收入，以維持一個龐大的翻譯出版開銷，確實有些吃力不討好。

此外，雖然峇峇們很努力的參與了馬來亞出版業的發展，但從幾份峇峇辦的報刊都壽命不長的事實看，新馬早期（甚至到了今天）的出版業並不十分發達，更確切的說，它是一個經濟效益有限的良心事業。當初曾錦

頁 11-12；梅井，〈峇峇翻譯文學與曾錦文〉，《亞洲文化》第二期，同上，1983，頁 4。

⁴⁰ William Gwee Thian Hock, *Mas Sepuloh: Baba Conversational Gems* (Singapore: Armour Publishing Pte Ltd, 1993). 其他相關研究如：Anne Geok-In Sim Pakir, *A linguistic investigation of baba malay* (Ann Arbor, Mich.: Univ.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1986./ Thesis (Ph.D.)--Univ. of Hawaii., 1986).

⁴¹ 原文見Tan Teck Soon, "Some Genuine Chinese Authors",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Vol. 1, No. 2, 1897, pp. 63-64.

文花了近四年的時間翻譯了共 30 冊的《三國》，由於當時章回翻譯小說的在峇峇讀者中的反應不錯，在翻譯至第二十一冊時，他便曾在卷末表示：如果這部三國《三國》有銷路，他將接續翻譯《列國》、《宋江》……等中國章回小說（見圖 2-II），然而當第二十二冊面世時，他卻感慨的說：由於《三國》的翻譯工作是一件絞盡腦汁的差事，他要求讀者原諒，因他再沒能力翻譯其他小說了。這番話引起了讀者的回應與鼓勵，在答覆一位署名為 G.G.C.S. 的信函中，曾氏表示：他如果能收回本錢，就願意繼續翻譯其他故事，因他不能繼續再蒙受虧損。雖然事後曾錦文改變了「不再翻譯」的決定，繼續翻譯了十餘部作品，但從這件事上，我們也看到了翻譯工作的難為。翻譯工作耗時費力，蕭海炎曾告訴讀者：「我是經過好幾次暈頭轉向才把這冊書（按：《狄青》）翻譯完。」⁴²鍾元文也告訴讀者：《三合寶劍》的翻譯工作停頓了，是因為他還有很多其他外務必須兼顧⁴³。要以一種正在滋長中的混雜語文翻譯中國通俗小說本就不是易事，再加上銷路不廣，因此這項「空得虛名」的翻譯工作，也吸引不了更多新進者加入，整個峇峇翻譯文學的進程因此無以為繼。

此外，早期出版業的不發達也衍生書本流通不廣的問題，也因此，如果堅持原文翻譯，翻譯者將經常面對材料匱乏的問題。例如 1930 年，《鍾無豔》的譯者便在序言透露：

許多讀者一定在舞台上看過《鍾無豔》的故事。但是，你們肯定沒有讀過這本書。那些說書人，他們能給你講許多中國古代的故事，他們肯定也沒讀過這本書，因為在新加坡你找不到這本書。我是通過一個朋友，他到中國去才幫我弄到這本書的。不過，我為了得到這本書，不得不耐心等待了四年之久。在中國許多人都想讀這本小說。這就是我們新加坡買不到這本書的原因。⁴⁴

總的而言，翻譯人才及材料的匱乏，讀者數量有限加上財力不足、戰後低迷的景氣導致銷量不臻理想等凡此種種，都是導致峇峇翻譯文學裹足不前而致衰微的原因。

⁴² “.....dengan amek banyak banting kepala baru lah dapat menjadi kan ini satu kitab”, Siow Hay Yam, *Ini Chrita dulu kala dari zaman Song Teow 宋朝 ber-nama Teck Cheng Ngo Ho Peng Lam 狄青五虎平南 (Lima harimo pergi pukul di negri s'bla s'latan)*, Vol. 1, 'Ka-nyata-an Chrita' (Singapore: Chinese Directory & Press Ltd, 1922).

⁴³ “Membritau kepada skalian Incek tuan-tuan.....ini hikayat bernama 'Sum Hup Poh Kiam', kitab ka-ampat suda terinti bagini punya lama, kerna ada perkara lain yang mesti di-jaga-kan dulu, jadi itu-lah pasal saya suda brinti-kan in buku. S'karang saya ada mulai sambongan-nya dan kasi habis sa-brapa dras saya boleh.....”, Cheong Guan Boon, *Cherita dulu-kala bernama Sum Hup Poh Kiam 三合寶劍 Di jeman "Han Teow" 漢朝*, Vol. 5, 'kenyata'an' 3 (Singapore: Kim Seck Hean Press).

⁴⁴ 參見 Lee Seng Poh, Ong Choon Teck, *Chrita dahulu-kala bernama "Cheong Moh Inn" 鍾無豔 atau "Hong Hor Muka Biru", Di zaman Choon Chew Liat Kok Buay 春秋列國末*, Vol. 1, preface (Singapore: Nanyang Romanised Book Co., 1938).

第三節 峇峇馬來語翻譯作品的展演形式

一、 翻譯題材的取捨

表 2-5：峇峇翻譯作品的主要題材

題材	數量
歷史	30
言情	17
俠義	15
志怪	11
公案	5

備註：本表統計不包括 1 部民間故事（憨子婿）、2 部宗教性作品（立願寶鑒）、1 部不確定原名（Yeo Chian）、3 部再版共 7 部譯作。另有一部合集（忠節義及賣油郎）則分別列入兩個不同的體裁。

從表 2-5 我們可以發現，峇峇所翻譯的中國通俗小說的題材主要包括歷史、言情、俠義、志怪及公案五大類。其中又以歷史小說最多，共三十部，言情小說次之，有 17 部，而俠義小說則略遜一籌，共 15 部，志怪小說有 11 部，最少的則是公案小說。

從附錄 2，三十部歷史小說中，以先秦為背景的有《封神演義》、《後列國志》、《東齊列國》、《姜太公》及《孫龐演義》等；描寫漢代歷史故事，最著名的當屬曾錦文翻譯的《三國》，另外則有《西漢》、《王昭君和番》及《三合寶劍》等。接著是唐朝的故事，包括有《反唐演義》、《綠牡丹》、《薛仁貴征東》、《薛仁貴征西》、《粉妝樓》、《紅面君主（趙匡胤）》及《羅通掃北》等。以宋朝為歷史背景的最多，包括了：《萬花樓》、《岳飛的故事》、《狄青五虎平南》、《三下南唐》、《楊文廣征南閩》及《狄青征北》。講述元朝歷史故事的有兩部，即講述女宰相故事的《孟麗君》，以及歌頌明朝開國的《臭頭洪武君》，而明朝的故事不多，只有《正德君遊江南》一部。最後清朝的歷史故事則有《洪秀全》一部。歷史通俗小說的核心內容雖然有依據史實的地方，然而，為了豐富故事的趣味性，在人物的塑造及故事的推演上，也往往會加入許多虛構因子。中國傳統文學觀認為，歷史小說具有翼史補經、勸善懲惡的作用，清代蔡元放在《東周列國志》序文有說：「顧人多不能讀史，而無人不能讀稗官，稗官固亦史之支流，特更演繹其詞耳。善讀稗官者，亦可進于讀史，故古人不廢。」可見相較於史官撰述的正史，故事性十足的歷史小說更易為普羅大眾所接受，其在民間的影響力也遠遠超越正史。在中國通俗小說中，歷史小說的數量龐大，因此，峇峇翻譯文學中歷史小說被選譯的頻率超高這不難理解。但就選材的角度，選擇了歷史題材，其主要原因可能是：

- （一） 由於這些歷史小說同時承載了許多中華文化元素，透過歷史小說的閱讀，在讀史之餘，也可直接濡沐中華文化。
- （二） 小說在補經之餘，透過故事有也闡發傳統倫理道德觀念，這尤其對

重視傳統禮教的峇峇人而言，是家庭教育中不錯的「教科書」。

被馬來文化涵化的峇峇特別喜歡吟頌馬來抒情歌曲（Dondang Sayang），或許也由於這份浪漫情懷，峇峇對言情小說似乎也情有獨鍾，尤其杏元小姐與梅良玉（附錄 2，第 1 及 49 項）、鳳嬌與李旦王（附錄 2，第 7 及 11 項）之間的愛情故事，分別有兩部不同譯本，其他言情小說還包括了《秦雪梅》、《紅面小姐》、《八美圖》和《菊花小姐》等。值得注意的是，陳志明在其列表中收錄了《三伯英台》及《陳三五娘》兩部言情小說，但譯者、出版年代及出版地皆不詳，根據陳志明所述，這兩本書目是抄自所閱讀過的廣告資料，筆者也嘗試搜尋，可惜皆無斬獲。因此，1950 年代以前除了蕭海炎曾以敘事詩體翻譯過《三伯英台》（附錄 2，第 32 項）之外，這兩部作品（小說）是否曾經被峇峇們翻譯出版過？由於無法掌握確實證據，這裡只能存疑。惟以這兩部愛情故事在通俗文學界的份量，《三伯英台》在印尼土生華人甚至爪哇民間受歡迎的程度，以及《陳三五娘》作為閩粵地區耳熟能詳的民間故事，這兩部作品在馬來亞峇峇翻譯文學中不被列入翻譯行列，才真是怪哉！弔詭的是，戰後唯一被峇峇人翻譯過的題材，卻是《三伯英台》（分別譯成敘事詩及劇本）而非《陳三五娘》。有趣的是，屬於北方故事的「山伯與英台」，在馬來亞或印尼一帶，其在華人圈中，受矚目的程度，一直是超越極具 Holo 及潮州民族色彩的《陳三五娘》故事。這現象或多或少意味著，流落南洋的華人，其本身的民族文化已在被以北方文化所侵蝕。然而這樣的侵蝕現象是早在這些漢人南來前已在華南地區發生，然後被帶到南洋，還是在南洋定居後由於「落葉歸根」的想念，誤把北方統治者的文化當成是「正統」的華人文化崇拜，而不自覺的使本身源自華南地方的民族性被掩蓋？就有待考證了。

然而，矛盾的是，談及言情小說，我們也發現了一個現象，在早期印、馬兩地的中國小說馬來文翻譯文學中，中國文學巨著《紅樓夢》，雖被譽為是小說經典，卻不曾被任何峇峇的翻譯過。這個現象或許可從以下幾點理解：

- （一） 從作者背景看，具滿族背景的曹雪芹，其著作不管從其語用習慣或文化習性看，都是屬於北方人的文化模式，這對祖源文化來自中國南方的峇峇人而言，沒有太大的投入感。換言之，《紅樓夢》比之山伯與英台的通俗性，它完全就是北方雅文化的產物，綜觀中國通俗小說的流傳，《紅樓夢》在早期似乎也很少被說書人或地方戲曲所引用，故峇峇接觸《紅樓夢》的機率不高。
- （二） 從內容看，《紅樓夢》的基調是批判中國封建社會的倫理道德觀，這對一向秉持中國傳統文化與道德觀念的峇峇而言，是較難被接受的。
- （三） 以峇峇翻譯者節譯的角度，《紅樓夢》人物的關係複雜、相互糾葛，故事的中心結構也非常強卻靈活不足，不像其他通俗文學作品，即便拆開節譯，都可以是架構完整的短篇故事。
- （四） 從題材看，《紅樓夢》雖也講述可歌可泣的愛情，但仍舊侷限於門

庭院落裡，其情感也是非常個人式的。這情況會許我們還可以從《紅樓夢》在蒙古文學的發展得到啟發：

《紅樓夢》在蒙古族作家文學發生大影響……但在說唱文學的領域裡卻找不到知音。說唱講究即興演出，沒有離奇情節很難吸引聽眾。題材不同，造成離奇情節的有無，英雄傳奇章回與家庭生活章回因此得到冷熱懸殊的待遇。事涉故事性質，無關族性，不獨蒙古族如此，漢族也如此。北京著名說書藝人在二〇年代已企圖把《紅樓夢》改編成說書故事，但終歸失敗。⁴⁵

二、 翻譯工作者與翻譯的表現手法

以翻譯工作者的角度切入分析，整個峇峇翻譯文學的發展，主要可以分為兩個階段，而分界點則在 1930 年代；換言之，峇峇馬來文翻譯工作的進行，從譯者的集叢特色看，前期以 1889 年到 1929 年為準，相等於峇峇馬來語翻譯文學的興起時期。後期則介於 1930 到 1950 年之間，無論從翻譯者、翻譯的表現手法、出版者或行銷方式，都展現出於前期不同的特色，而其時間縱深也橫跨峇峇翻譯文學發展的「繁盛」和「沒落」時期。以下簡略就前期和後期的翻譯工作者之差異進行分析，並嘗試以各期具代表性的翻譯者為探討基點，以期對他們的翻譯工作和表現手法有更深一層的瞭解。

（一） 前期（1889-1929）的翻譯工作

以 1930 年為界，我們可以明顯看到，30 年代以前主要的翻譯工作者，包括了陳明德、賴甘霖、石瑞隆、平瑞公司、林福志、曾錦文、黃介石、吳連柱、馮德潤、劉西、劉金國、鍾元文及蕭海炎等 13 人，而參與協助者有陳謙福、謝子佑及謝安祥三人，都曾對曾錦文的翻譯給於校閱與評點，另外這是時期出版的翻譯作品中，兼有插畫的雖然也不少，但由於作品內未加註明，因此很多插畫作品原畫者不詳，例如 Lye Kam Lim 所譯《憨子婿》內的插畫便是，而這時期唯一知道的插畫家，就是曾為曾錦文、黃介石及馮德潤等人的譯作畫過插畫的陳璧光。總的而言，前期參與翻譯工作的，大約有 17 人，且從翻譯工作的實際操作看，除了曾錦文在譯《五美緣》、《反唐演義》及《三國》時曾得力於陳謙福等人的校稿與批評，石瑞隆與平瑞公司合譯了《忠節義、賣油郎(合集)》(1889)和《三國故事薈萃》(1889)外，這時期的翻譯工作經常是採單打獨鬥式，換言之，從漢文到峇峇馬來文的翻譯、抄寫及校對等，皆由譯者一手包辦。另外，除了曾錦文曾自己出版過《水滸》(1899-1902)及《西遊》(1911-1913)外，這時期的譯作通常都交由出版公司出版，這些出版公司包括有：寶華軒 (Poh Wah Hean Press)、金石齋出版社 (Kim Sek Chye Press)、商業出版社 (Mercantile Press)、德諾達雅出版社 (Denodaya Press)、鴻盛出版社 (Hong Shing)、江

⁴⁵ 引自林修澈、黃季平，《蒙古民間文學》(台北：唐山出版社，1996)，頁 346-347。

源興出版社 (Kong Guan Hin Press)、商輅出版社 (Siang Lok Press)、聯合出版社 (The Union Press)、叻報出版社 (Lat Pau Press)、法石齋出版社 (What Sek Chye Press)、金石軒出版社 (Kim Seck Hean Press)、中國工商名錄印刷公司 (Chinese Directory & Press Ltd.) 共 12 間，其中又以金石齋出版社和寶華軒的出版量最多，分別出版了九部和四部譯作。惟值得注意的是，從這 12 間出版公司的所在地看，這些翻譯作品幾乎全都在新加坡出版。

回到翻譯工作者的面向，這時期的翻譯者以最早的陳明德和其繼承者曾錦文的作品最多，各有五部作品，然而若從翻譯的質跟量看，曾錦文的翻譯成就又略勝陳明德一籌；至於其他譯者，除了蕭海炎可能翻譯過 5 部作品外，其他產量大都介於 1 到 3 部之間。總的而言，這時期的翻譯工作者個別的產量貴精不貴多，而其中的代表人物則非曾錦文莫屬。

曾錦文，1851 年出生於檳榔嶼一個峇峇家庭，曾氏曾以筆名峇抵彥東 (Batu Gantong) 翻譯過《五美緣》、《鳳嬌與李旦的故事》(即《反唐演義》) 和《三國》，而 Batu Gantong 據說便是其出生所在地。他的父親曾容泉經常往返於檳榔嶼與蘇門達臘的巴東之間經商。曾自小便在檳城大英義學 (Free School) 接受基礎教育，然而同時父親也為他請來私塾老師教導其漢文。此外，曾氏在威省 (Sabrang Sunghei Prye) 生活期間，由於經常與馬來朋友接觸，其馬來文造詣也比一般峇峇華人精進，凡此種種的語言經歷，都為往後他 (峇峇) 馬來語、英、漢三語通譯的成就打下深厚的基礎。1866 年曾錦文於大英義學畢業後，便轉往中國福州馬尾水師學堂 (即海軍學校) 學習軍事戰術，惟由於體能欠佳，畢業後僅能留在原校教導數學。1872 年，20 歲出頭的曾錦文，由於聽信算命先生的預言，說他活不過 25 歲，便毅然決定回到檳城母親身旁，度過餘生。然而回鄉數月後，他又因工作表現優良而被白人上司升調到新加坡工作，便從此定居於此，直到 69 歲逝世。1899 年，峇峇陳明德在翻譯了前三冊的《鳳嬌與李旦》後，便因私人業務前往日本發展，留下尚未譯完的後半部作品。而後曾錦文便在好友陳謙福 (Tan Kheam Hock, 1862-1922) 的邀請下，接手《鳳嬌與李旦》第 4 到 8 卷的翻譯工作，並在 1892 年翻譯完成後還意猶未盡的重譯了前三卷。根據曾錦文在譯本中的陳述，他在翻譯《鳳嬌與李旦》及《三國》時，曾得到陳謙福、謝子佑及謝安祥等人的協助，然而從他的所有譯作及內容看，曾的翻譯工作更多時候是獨力完成的。從《鳳嬌與李旦》開始到目前所能找到的最後一部譯作《西遊》，將近 22 年的歲月中，曾氏翻譯了包括《鳳嬌與李旦》(8 卷，1891-1893)、《五美緣》(6 卷，1891-1892)、《三國》(30 卷，1892-1896)、《水滸》(19 卷，1899-1902) 和《西遊》(9 卷，1911-1913) 共五部，總卷數高達 72 冊的中國通俗作品。

值得注意的是，曾錦文曾在部分《三國》的卷尾，給讀者列出了他預計要翻譯的作品，這其中包括：《今古奇觀》(Kim Kö Ki Kuan)、《聊齋》(Leow Chai)、《包公案》(Pow Kong Ann)、《施公案》(Si Kong Ann)、《藍公案》

(Na Kong Ann)、《水滸(或宋江)》(Swi Hⁿo atau Song Kang)、《金石緣(或林愛珠)》(Kim Sek Yan (Lim Ai Chu))、《齊天和尚》(Chey Tian Hoey Siö^h)、《溫如玉》(Wan Ju Yak)、《更五鐘》(Keng Gnö Cheong)、《先秦軼事》(Sian Chin Ek Su)、《粉妝樓》(Hoon Chong Lau)、《七俠》(C'hit Hiap)、《征東》(Cheng Tong)、《征西》(Cheng Sai)和《賀五太》(Hö Gnoh Tai)等 16 部中國通俗小說(見圖 2-II),也因為這份列表,有些學者的著述曾把這其中的書目列入「已完成的譯作」處理⁴⁶,然就筆者反覆考察後,列表上除了《水滸》及《西遊》(即齊天和尚)有被譯過,而《今古奇觀》則以節譯的方式安插在《三國》的第 28、29 及 30 卷外,這裡面大部分作品截至目前我們都無法肯定它確實被翻譯出來,因此,將列表中所提及的作品都視為是「已完成的譯作」,這作法仍有商榷的餘地。

言歸正傳,以曾錦文的翻譯為例,這時期的翻譯作品,在表現手法上,主要展現出以下幾個主要特點:

1、從內容看:

這些譯作雖然不是完全按照通俗章回小說原文逐字逐句翻譯,而是節譯或意譯的方式,然而有趣的是,在形式上,卻也延續了「說話文學」體制中「篇首」⁴⁷及每回最後以「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作結的模式。首先,在「篇首」方面,早期的翻譯工作者有好幾位承繼了這個中國傳統小說中的表現手法。例如:在《雷峰塔》(1889)的開卷中,陳明德便以一首馬來詩文入話:⁴⁸

原文	意譯
Jikalau suda pulang kesana, panday panday menyimpan diri, jikalu tuan bijak laksana, saya pun ada sadia di sini.	如果已回到那裡, 請妥善隱藏自己, 如果看官智慧滿盈, 我亦有備於此矣!

同樣的,曾錦文也延續了前輩「篇首」的作法,幾乎每卷都以一兩首英詩引人入勝,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則屬他在《三國》第十二卷中的〈心聲〉與〈獨白〉:⁴⁹

⁴⁶ 見梅井〈峇峇翻譯文學與曾錦文〉《亞洲文化》第二期,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1983。

⁴⁷ 中國通俗章回小說是自(講史)話本脫胎而出,自然的也延續了說書文學的一定的格式。章回小說通常全書分若干回,每回以回目(一般是對偶句)揭示本回內容,各回故事有延續性,卻也各自獨立,並且行文之間也免不了說唱文學中「看官」、「話說」等字樣。因此從翻譯本的模式看,翻譯的原文本大都是當時流行的章回小說。「篇首」乃說話體制名詞,為「說話」之開頭,通常是一首或數首詩、詞或兩者兼用。參見:王文寶、盛廣智及李英健編,《中國俗文學辭典》(吉林:吉林教育出版社,1987),頁 12-13、233。

⁴⁸ 見Tan Beng Teck, *Ini-lah buku bernama "Lwee Hong Thak" 雷峰塔 charita dahulu kala dari pasal, Oh Pek Chua 黑白蛇 sama Kho Hun Boon 許漢文 Di turon-kan dari surat China di jaman Guan Teow 元朝, Di Chnee Tong Quan 錢塘縣, Dalam prenta-an Chat Kang Hoo 浙江, Singapore: Poh Wah Hean Press, 1889, p. 113.*

⁴⁹ 原文引自Batu Gantong, *Chrita dahulu-kala nama-nya Sam Kok 三國 atau Tiga Negri Ber-Prang :*

原文	意譯
<p>I. “The Voice of Sam Kok”:</p> <p>I’ am a lovely little thing, Coming monthly from the print, In me there are to be found, Thirty volumes all well bound.</p> <p>The history that I told, Is of the Three States of Old, ‘T is household tale’ mong Babas, To children told by papas!</p> <p>In tongue-Malay I chatter, And Romans in character. Thus, you’ll not be laid astray, But known in every way.</p> <p>The money on me you spend, My contents will make it mend, For all I hold and contain, Are treasures worth to maintain!</p> <p>Thanks, friends and gentleman, do Who, their good wishes sent to Batu Gantong, my master, Whom I style a professor!</p>	<p>〈三國的心聲〉</p> <p>我是可愛的小東西， 每月刷一卷， 你會發現， 三十三卷都裝訂精美。</p> <p>我所敘述的歷史， 是關於古老的三國。 是在峇峇家庭中， 爸爸講給孩子聽的故事。</p> <p>我娓娓用馬來語道來， 透過小說人物展演， 因此，你將不會茫無頭緒， 而是瞭若執掌。</p> <p>你花在我身上的錢， 我的內容將令它物有所值， 我所掌握與包容的， 是值得珍藏的寶貝。</p> <p>感謝諸君與友好， 哪些寄上美好祝福予， 我的主人——峇抵彥東 這位我尊稱為教授者。</p>
<p>II. “Batu Gantong’s Soliloquy”:</p> <p>Light of renowned Khong Beng! May it shine On land remote- The Straits May it impart doctrines divine Or knowledge of Three States.</p> <p>Oh the times! When Siok, Gwi, Gor Played so a part On the World’s stage none of us e’er saw, Either the end or the start.</p> <p>Glorious will my service be To Straits-born foes and friends, Whose hearts will I tickle to glee If success crowns my ends.</p>	<p>〈峇抵彥東獨白〉</p> <p>願諸葛孔明的智慧之光， 照耀遙遠的馬六甲海峽旁土地， 願他授予我們真理玄機， 或三國的廣博的知識。</p> <p>在蜀、魏、吳爭鋒的哪個年代， 在我們從未見過的世界舞台上， 從故事的序幕到落幕， 他們都投入角色，各據一方。</p> <p>這將是我光榮（愉快）的貢獻， 我海峽出生的朋友和敵手們， 若我討喜的譯文能觸動你心， 這就是我最終的目的。</p>

<p>Ambition, honor, I don't seek. Nor way to fame my claim, My cherished object-plain to speak Is not money, nor name.</p>	<p>功名、利祿，非我所求， 亦非我求名的志向， 我懷抱的目的，坦白說， 不為錢財不為名。</p>
<p>Why tarry? Here then goes my pen, Here burns the mid-night oil, Hurrah! As much as volume ten, Has good fruits borne my toil.</p>	<p>我毫不遲疑振筆疾書， 挑燈夜戰也在所不惜， 萬歲！！我已譯了近十卷， 辛苦耕耘終於結成豐美的果實。</p>
<p>Praises poured in from e'vry side, Methinks, in air I stand; Brains ransacked, hundred books my guide, Great is the work on hand.</p>	<p>來自四面八方的讚美， 我感覺飄飄然如在雲端； 回頭細想，眼前待譯的書有上百本， 手頭上的工作仍異常艱鉅。</p>
<p>Speed on, Ah, how my eyes they pain, Haik! the same feels my purse. A hole, a hole! Out my funds drain, It is fortune reverse.</p>	<p>快馬加鞭，喔！我的眼睛疼痛不已。 唉呀！我的口袋也不好過， 洞，都是空洞！我的資金消耗殆盡之餘， 是我財運的退縮。</p>
<p>Friends! Readers! Please my pockets mend, Save me from bankrupt's mice; My works please largely recommend, Prove you "Sam Kok" admire.</p>	<p>朋友啊！讀者們！請修補我口袋的空洞， 把我從破產危機中解救出來， 請廣為推介我的譯作， 以證明你對《三國》的讚賞。</p>
<p>12th September 1893</p>	<p>1893年9月12日</p>

明顯的，從這些篇首詩我們知道，這些詩文並非翻譯，而是譯者自創，是譯者作為一個「引介」者的入話方式。從詩文我們也可瞭解到，曾錦文雖曾謙稱並未十分熟悉馬來語的應用，希望朋友們仍能看懂他「膚淺的馬來文」，但事實上他不僅峇峇馬來文掌握自如⁵⁰，英文也非常了得；而陳明德的詩文，詩中並未雜入任何Holo詞彙，諸如‘menimpan’，‘laksana’等的淺詞用字，同樣的也展現了他深厚的馬來文造詣。然而，以馬來文入詩並不是一件易事，因此，後期由於翻譯方式的「速食化」與「分工」，像這類的「篇首」作法相對少見。

此外，我們知道，章回小說是從宋元講史話本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早期宋元藝人的小說，故事都較短小，可一次講完，話本一般都沒有分章節，後來，由於講史的興起，歷史故事內容冗長，須分多次講說，為了讓聽眾記憶猶新、加深印象，每次講故事時便有一個中心內容，及一個醒目的標題，進而逐步形成分章立回目的體例。與此同時，為了吸

⁵⁰ 曾氏深厚的馬來文造詣，從他經常能將古典小說中的詩詞用峇峇馬來語直譯出來，並且同樣以詩文的形式出現便可明瞭，例如他在翻譯《三國》劉備三顧茅廬一節時，便把「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一聯用馬來語流暢的表達出來。(參見Batu Gantong, *Chrita dahula-kala nama-nya Sam Kok 三國 atau Tiga Negri Ber-Prang : Siok 蜀, Gwi 魏, sama Gor 吳, Di jaman "Han Teow" 漢朝* (Singapore: Kim Sek Chye Press, 1893), vol. X.)

引觀眾，每次說書人講說故事時，總在緊要關頭打住，而在末尾形成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的形式，來吸引聽眾，令聽眾欲罷不能，有興趣再聽下去。故此，「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可說是中國許多古典小說每章耳熟能詳的結尾。或許是受當時說書的影響，亦或忠於原著，無論早期或晚期的峇峇翻譯工作者似乎很自然的便接收了這套模式，例如：

Berenti-kan di sini dulu, boleh bacha di buku nombor X, nanti boleh dapat tau puas puas hati.

或

Kalau mau tau blakang punya kesah lagi, bacha lah di nombor x punya chrita boleh dapat tau sampey trus trang.”

2. 詞彙對照表

由於民族情境不同及語言轉換的問題，原文中許多詞彙並不容易以馬來語清楚表達，因此，譯者通常必須在譯文中附上漢文（尤其名詞）或附註，以曾錦文為例，他翻譯時不僅中英並用，也經常在各卷正文前附載馬英或華英對照詞彙表，如《三國》第十五卷有漢英詞彙表，《水滸》的第六、十三及十四卷也附有馬英對照詞彙表。

3. 裝訂方式與插圖

要區別早晚期譯作之不同，最大的顯像就在於作品的裝訂與內文附載的插畫上。首先，譯作各卷頁數有 40 幾頁到 150 頁不等，但以超過百頁的居多，尤其曾錦文的譯作，其譯作頁數每卷都厚達 150 頁左右。另外，早期的譯作也非常重視插畫的並用，以曾錦文為例，有時候插畫的頁數甚至佔二十到三十頁之多。然而，由於能畫插畫者不多，目前知道的插畫家來去也只有號稱蓬島的陳璧光及僅為〈宋江〉封面劃過人物像的鄭芳菁兩位，其中以陳璧光的產量較豐，不僅封面的人物像，也畫過許多具情節性的插圖，豐富了譯作的可看性，值得一提的是，在曾錦文翻譯的《五美緣》（1891-1892）第五卷的幾幅故事人物畫作中，陳璧光也翩然以近似明朝「六品芝麻官」的自畫像出現在第二頁中，形象逗趣。不讓陳氏專美於前，曾錦文也將自己戴帽留辮的照片刊載在《三國》第 15 卷和第 24 卷中，讓讀者一睹他的廬山真面目。當然，在筆者翻過的大部分的峇峇翻譯作品後，兩人者作法是較為特出的。此外，或許由於早期的翻譯工作是獨立作業，翻譯的動機也比較單存，早期的譯本除了附有出版商（通常也是經銷商）的地點外，封面或封底幾乎沒有刊登其他具商業性質的廣告。

（二）、後期（1930-1950）的翻譯工作

後期的翻譯工作筆者主要以 1930 年與 1950 年為起迄點，在這期間，主要的翻譯工作者包括有：袁文成 (Wan Boon Seng)、蕭欽山 (Seow Chin San)、周天昌 (Chew Tian Sang)、邱平炎 (Khoo Peng Yam)、蕭丕圖 (Seow Phee Tor)、黃振益 (Wee Chin Ek)、高尊尼 (Koh Johnny)、林秀興 (Lim Siew Him)、高春廣 (Koh Choon Kwang)、傅長壽 (Poh Tiang Siew)、李成寶 (Lee Seng Poh) 等 11 人，其中李成寶最初只是從旁協助袁文成與邱平炎等人的翻譯工作，直到後期，他已開始在漢文本閱讀者王春德 (Ong Choon Teck) 的協助下，嘗試翻譯了《鍾無豔》(1938-1939 年) 及《大鬧三門街》(又稱《李廣》，1939 年)。這時期除了有翻譯助理如：林振才 (Lim Chin Chye) 與李成寶外，與前期翻譯工作最大的不同在於譯者在翻譯時，多了一位「漢文本講述者」(Chinese reader) 的協助，例如：N. M. Seng 曾為袁文成讀述《粉妝樓》(1934) 及《三合明珠寶劍》(1935)，陳友益 (Tan Yew Aik) 為袁文成等人讀述《濟公活佛》(1935)、《趙匡胤》(1936)、《南極翁孫贖》、《一枝梅平山賊》及《三國因》等，另外還有陳進傳 (讀述過《天豹圖》，1935 年) 及上面提過的王春德。換言之，這時期的翻譯工作有別於前期的多非單打獨鬥，而是以各司其職的團隊模式進行。必須借助一位漢文讀述者轉譯，某程度上這也意味了峇峇社會在 1930 年代前後已進入了各語言相互消磨激烈的年代，在書寫上峇峇馬來文固守、英文抬頭，而漢文則支離破碎，因此這時期能讀懂漢文原本的譯者已相對減少。總的而言，這時期參與翻譯的峇峇共有 16 位左右，相對於前期，以僅僅十年的時間對比，譯者人數是稍多的，其中又以袁文成的產量最豐，他參與翻譯的作品共有 23 部之多，可謂這時期翻譯工作的佼佼者。

關於袁文成的生平，由於資料的亡軼，目前所知不多。袁文成真正為人所認識，是從 1920 年代他積極參與峇峇馬來文的刊物出版與翻譯開始。1924 年到 1931 年期間，袁氏曾自行或與人合作出版過幾份峇峇馬來文刊物 (詳見本章第一節)，這直接也間接的為他自己及峇峇社會的翻譯工作提供了發表的空間，也因這有利條件，他最後順利過渡到翻譯者的層面。袁文成不僅身兼出版商、翻譯者的工作，事實上他也寫得一手漂亮的峇峇馬來文詩歌，他雖不諳漢文，但其翻譯及詩歌創作再再顯示出其馬來文根底雄厚。關於袁文成的創作，我們留待第四章再談，這裡先談談由袁文成所領導的峇峇馬來文後期翻譯工作的特色：

1. 在內容上，這時期的譯作多省略了前期「篇首」入話的作法。而每章以「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的做法則某程度保留。
2. 在淺詞用字上，不知是否因譯者必須仰賴「漢文讀述者」轉譯的緣故，這時期所用的峇峇馬來文相較於前期曾錦文等人的馬來語，則更趨近 Holo 化。另外，或許個人語言能力的侷限，這時期的譯本也

省去了前期曾錦文等人附上「馬英」或「漢英」對照的詞彙表。早期的翻譯者如曾錦文，常喜歡在譯文中穿插一些趣味性評談和敘述，或乾脆在註釋上引用英文詩詞，而各卷末也經常可見一些附錄的短篇寓言、笑話或幽默故事，以滿足讀者需求。而這樣的作法在後期的譯本中較為少見，尤其皆不做如曾氏般偶爾以他濃厚的中國傳統文化觀念針對劇情進行評點。

3. 從譯作的出版模式看，這時期的譯本每卷薄薄二三十也左右，也因此，各部的卷數也較前期的譯作多，相對的，每冊價錢也較前期的一元左右低廉，介於兩毛到三毛之間，但事實上，這價錢若以「一部」計算，分冊加乘後的價格，絕對比前期來得高。而這也顯現出後期出版者的商業頭腦，以「薄價多銷」的方式，提高讀者購買的意願。在出版商方面，相對 1930 年以前，則呈現多元紛呈的局面，出版商包括出版者本身，共有約 19 家，不僅多於前期（前期譯者兼出版商的情況也較少），且幾乎與前期的出版商沒有重疊。並且，從一些譯作中，我們也瞭解到，除了在新加坡出版經銷，以和成寶發公司及 D.T. 林公司關係良好的袁文成爲例，這些譯作的發行網，甚至遠及馬六甲和檳城各地。此外，譯本各卷不僅插圖不多，且有些頁面經常用以刊登廣告，例如：袁文成的譯作經常會幫 D.T. 林公司刊登一些印尼土生華人翻譯作品的目錄廣告，這雖不足以說明印尼土生華人對新馬峇峇馬來文翻譯工作的影響力，但也意味著兩這之間一定的聯繫，更直接凸顯了後期譯作出版的商業色彩，這是否有受當時印尼蓬勃的翻譯出版業所影響，這於理可推了！

三、翻譯作品的流傳

接著，我們來簡短探討有關峇峇馬來文翻譯作品的流傳問題。由於資料的散佚不易掌握，要真正還原當時峇峇社會中翻譯作品傳佈的整體變貌，事實上並不容易。然而，作品的流傳卻往往是我們瞭解中國文學對峇峇的影響和它可能與馬來文學交流的關鍵所在，因此，我們還是有必要抽絲剝繭的探討一番。

從上述的討論中，目前我們僅確定這些在新加坡出版的譯作有傳銷到峇峇聚居的馬六甲與檳城地區，其他地方這些譯作沒有透露，我們也不得而知。但這裡筆者嘗試從袁文成身上著手，袁文成創辦的刊物，曾刊載過一些譯作，以《土生華人之星》（*Bintang Peranakan*）爲例，其經銷地除新、馬、檳三地外，也遍及吉隆坡、巴珠巴轄、新山、芙蓉、瓜拉庇勞、金保、太平、怡保、北海、亞羅士打、雙溪大年、丁加奴、古晉、納閩、廖內群島及爪哇（泗水、三寶壟）及曼谷等地。如此廣闊的一幅地圖，幾乎讓人立刻聯想到當時馬來亞的經濟命脈錫礦的開發和華人南移聚居的所在。當然，我們不能就此武斷這些譯作的讀者包括非峇

峇華人或馬來人，從當年峇峇在新馬地區商業活動上的活躍程度看，我們僅能推測有少部分峇峇因生活所需散落在這些地區⁵¹。然而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根據對華馬文學交流頗有研究的莊華興透露，這其中有些地區，尤其森美蘭州的瓜拉庇勞在戰前是馬來文化及馬來文學（出版業）的重鎮，例如馬來學界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札巴（Za'ba），便是生長在瓜拉庇勞附近的一個小村莊⁵²。因此，若說新客華人要讀懂峇峇馬來文翻譯作品並不容易，那流傳到這些馬來地區的翻譯作品在主攻峇峇讀者之餘，小部分馬來人是否也因為有機會接觸而拜讀呢？我們不敢確定，但峇峇馬來語文學與馬來文學之間的交流，通過這點，是可以作初步聯想的。

儘管早期這些譯作在新馬的流傳廣到甚麼程度，對其他民族是否有影響，我們無法確認？然而，透過許多峇峇人傳記或資料顯示，這些翻譯作品對峇峇社會本身而言，確實是相當受歡迎且在當時具有一定的影響力。這裡我們且聽聽他們本身的說法：

1. Though most Peranakans lost the ability to read Chinese from the late 19th century, they maintained an interest in Chinese classics and novels through translations in Baba Malay, which were published for the Peranakan community...⁵³

（譯文：儘管到了 19 世紀晚期，許多土生（華人）已經失去閱讀中文的能力，但透過這些針對峇峇社群所出版的峇峇馬來語翻譯作品，他們對中國古典文學的興趣不曾中斷。）

2. 在《一個娘惹精工圖——我母親的童年》中，魏天福的母親說道：

Father...when he was not out...he usually at home playing cher kee. Otherwise, he would be found reading. He was rather fond of reading the *Cherita Dulu Kala*...they were very popular with the Babas. Practically every home had these volumes which were highly treasure...Among the most famous of these translated works was *Sam Kok*...Among a certain section of the Baba community it was believed that because of the many intrigues and machinations in the plot of the *Sam Kok*, those who read it were pick up bad ways. As such, those who were known to have read the stories were shunned and avoided. Father never hid the fact that he had read the translated classics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the fact that the womenfolk included him in their cher kee session was clear indication of the respect they had for him inspite of his having read *Sam Kok*. Occasionally, father would relate to us interesting

⁵¹ 例如筆者在馬六甲田調時，碰上一位老娘惹，便告訴我她不是馬六甲人，是來自森美蘭州的娘惹，這完全有違我們的既定印象。另外，著名的峇峇伍連德也曾經在怡保居住過一段長時期，魯白野也在怡保出生。可見，有少部分峇峇人，會因生活所需，零散移居到新加坡、馬六甲與檳城以外的馬來州屬。

⁵² Za'ba，全名Zainal Abidin b. Ahmad（1895-1973），1895年出生於森美蘭州，為近代馬來文壇有名的文學及思想家，在現代馬來語的翻譯及羅馬化拼寫上，有著舉足輕重的貢獻。關於瓜拉庇勞為馬來文化早期重鎮一點，筆者有幸於今年（2004）四月間與到台北參加東南亞學術研討會的莊華興老師見面，此乃討論時莊老師提供的靈感，特此說明，不敢居功。

⁵³ 引自Peter Lee and Jennifer Chen, *Rumah Baba: Life in a Peranakan House* (Singapore: Singapore History Museum, 1998), p. 91.

tales from some of the other translated works he had read. That was how I learned why we dubbed people with a hearty appetite Seet Jin Quee....⁵⁴

(譯文：父親不外出時，通常喜歡玩十二支，此外也喜歡閱讀，尤其是「古早故事書」(*Cherita Dulu Kala*)……這些書在峇峇之中很受歡迎，幾乎每個家庭都收藏幾冊，並珍而視之。這其中最著名的翻譯作品便是《三國》，峇峇社會中某些人認定該書情節中處處隱含的謀略詭計，會誤導它的讀者，有些人甚至會對那些讀過該書的人敬而遠之。父親從不隱瞞他讀過中國古典文學翻譯作品，而且事實上，儘管他讀過《三國》，他的那群女性牌友仍然願意和他一起玩十二支，這也意味了她們對他的尊重。有時候父親會告訴我們一些他從這些翻譯著作中讀到的有趣故事。而我就是從這裡學會管那些胃口特大的人叫薛仁貴……)

3. 峇峇魏天福回憶道：

During the Baba publications' existence, the translated works especially proved immensely popular and it was a rare exception indeed at that time to find Baba home without copies of them.⁵⁵

(譯文：當峇峇出版業仍然活絡的時候，那些(峇峇馬來語)翻譯作品非常受歡迎，而且(你)很難找到有哪個峇峇家庭中是完全不收藏翻譯作品的。)

4. 田調期間，蔡女士在談及關於峇峇馬來文翻譯小說時，也告訴筆者：

以前這些書是很普遍的，不僅僅是一本一本書，也有在雜誌連載，這是我爸爸跟我講的，我也是沒有看過，他的他放在舊家，他們通通丟掉了，所以我自己本身都沒有看過這樣的雜誌，不過那些峇峇人的屋子，一定是還有的啦！只是他們有的收起來，不要跟我們講吧了！……我們要知道，為甚麼叫Baba Nyonya？因為他們一直叫(我們)Baba Nyonya，但現在很多人都忘記其實我們是中國人，也是華人來的……以前我小時候有講是峇峇人啦，因為我們不會講中文……⁵⁶

談及峇峇馬來語翻譯文學的影響性和價值問題，一些英式教育出身的峇峇知識份子有對其嗤之以鼻者，例如方寶成(Png Poh Seng)便曾在其文章中表示：

Baba Malay was little more than a spoken language. When it came to reading and writing the Straits Chinese turned to English. A few did try their hand at writing in Romanized Baba Malay, including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historical romances such as the *San-kuo* and Christian hymns for use in Protestant churches, but no substantial literature emerged in that medium. A spoken language without a literature is not creative or self-perpetuating, and is less likely to

⁵⁴ Gwee Thian Hock, *A Nonya Mosaic: My Mother's Childhood* (Singapore: Times Book International, 1985), pp. 107-108.

⁵⁵ 引自William Gwee Thian Hock, *Mas Sepuloh: Baba Conversational Gems* (Singapore: Armour Publishing Pte Ltd., 1993), p. xxxiii.

⁵⁶ 2003年3月17日，馬六甲田野訪查記錄。地點：青雲亭，受訪者：蔡女士。

survive.⁵⁷

(譯文：峇峇馬來語比較屬於口語形式，當需要閱讀或書寫時，海峽華人會轉向英語。有少部分人嘗試用羅馬化峇峇馬來文書寫，包括翻譯像《三國》這類中國歷史小說以及用在教堂中讚誦的聖詩等，然而，這個媒介語並沒有產生過較具文學份量（價值）的文學（作品）。缺乏文學（性）的口語是沒有創造力的，也沒有自力更生的力量，而且繼存的可能性也小。)

無可否認，口語的繼存確實需要文學的支撐，這點筆者認同方氏的看法；但是就峇峇馬來語而言，並不是它所書寫的文學沒有價值，而是客觀事實或環境的改變，使這些文學作品不被重視或珍惜，乃至沒落。而這樣的沒落，即峇峇馬來語的變相沒落，「缺乏有價值」的文學不應為此負上全部責任，個人認為，反而是峇峇文學的式微，峇峇馬來語的失傳該負上絕大部份的責任。此外，回到當時的時空背景，峇峇馬來語翻譯文學不僅是峇峇閒餘的消遣品，更是峇峇譯者或讀者們賴以與中華文化銜接的重要橋樑，透過故事闡述中國傳統價值觀念，已涵化的峇峇因而重新與漢系文化接軌，它不僅是峇峇借以瞭解祖先文化的入門，更是許多峇峇家庭教育中的活教材。除了因為馬來伊斯蘭化的隔閡，當初峇峇沒有進一步往更深層的馬來化方向走，這些峇峇馬來語中國通俗小說翻譯作品，我想或多或少產生過一些拉拔作用。

第四節：峇峇馬來語的籤詩翻譯

2002 年筆者於馬六甲進行調查時，在當地最古老的宮廟——青雲亭中發現了一本用峇峇馬來語翻譯的手抄解籤書（見圖 2-III），在筆者跑過新馬各地的大小廟宇之餘，這個發現著實讓我喜出望外，筆者不敢斷言它是世上唯一的籤書譯本，但就筆者看來，這本手抄本絕對是新馬絕無僅有的峇峇馬來語籤詩翻譯本。雖然，經過筆者長時間的觀察，這本陳舊的峇峇馬來語解籤書在當今的使用率微乎其微，甚至不如另一本用英文翻譯的解籤書，偶有一兩位善信前來翻閱，但就青雲亭和峇峇之間的歷史淵源，它的意義是不容小覷的⁵⁸。我們知道，籤詩與中國民間信仰以及俗文學之間的關係密切，將「籤詩」帶入本論文探討，除了基於籤詩也是「民族文學」的一種形式之外，筆者認為，這樣的籤詩翻譯作品，無疑

⁵⁷引自Png Poh Seng, "The Straits Chinese in Singapore: A Case of Local Identity and Socio-Cultural Accommodation",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10(1) (Singapore: Dep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Malaya in Singapore, 1969), p. 108

⁵⁸ 馬六甲的青雲亭，是馬來西亞歷史最悠久的華人廟宇，建於 1673，在當地歷史上一著團結華人，領導華社的積極作用，並且在 300 多年的歲月中，一直是峇峇民間信仰中非常重要的參拜地。2003 年農曆正月初九至十六日筆者正於馬六甲調查，其實正是該廟香火鼎盛的日子，在正月求籤問事者也異常熱絡，據觀察前來拜拜的峇峇人也不少，但一個星期下來，筆者峇峇馬來語跟英語籤書抄完，其間除了兩位操英語的華族男性翻過英譯本外，峇峇馬來語譯本則始終只有筆者一人在翻閱。

也是一種峇峇對中國傳統宗教和文學吸收的另類反映。

圖 2-III：《青雲亭六十甲子籤詩解》原文本及譯本



說明：第 1 及第 4 本為漢文、第 2 本（小、綠）為峇峇馬來文譯本、第 3 本為英譯本。

（黃慧敏，攝於：2003/2/14，馬六甲青雲亭。）

有需求才會有供給，出現這樣一本峇峇馬來語的籤解譯本，其原由不難理解，而英譯本根據筆者向廟方瞭解，是近幾年應善信（更確切說是旅客）需求，才從峇峇馬來語籤書譯本轉譯過來的。那究竟峇峇馬來語的解籤譯本是甚麼時候出現，又是由誰翻譯出來的呢？最初廟內的工作人員皆稱：「不清楚，只知道很久了。馬來文的是峇峇人翻譯的，[懂不懂漢文？]這個不知道，只知道他看很多古書。」一些年老長輩也告訴筆者：「[譯本在他]小時候就有了」。

首先，關於翻譯的時間問題，或許我們可以透過籤的內在行文去瞭解，例如，在「解曰」項中（見表 2-6），譯者把「行人」或「來人」項譯為 Orang Belayar(航行的人)，“layar”馬來文為布帆、帆船的意思，加上動詞前綴“ber-”則意為揚帆行駛，回歸歷史背景看，人們遠行普遍以（帆）船代步的，應是在非常早的時期。另外，“Berchara”(官事)也是譯者選譯的熱門問題，十八世紀以前，由於華人人數少，生活單純，要面對訴訟問題的機會不大，況且馬來文“bicara”一詞也隱有「法院訟辯」的意涵，往上推溯，峇峇會碰上「法庭訴訟」，這應該是西方殖民者到來以後的事情。因此，根據以上兩點，我們可以推測，該籤書的峇峇馬來文翻譯本大約產生於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這段時間。

再者，若以籤的原文與譯文對照（見表 2-7），我們會發現，在多項籤解項目中，譯者並不是全盤照搬，而是挑了其中幾大項目翻譯，其中在譯文本出現過的

「解曰」包括了表 2-6 所列的幾大項：

表 2-6：籤「解曰」原文與峇峇馬來文對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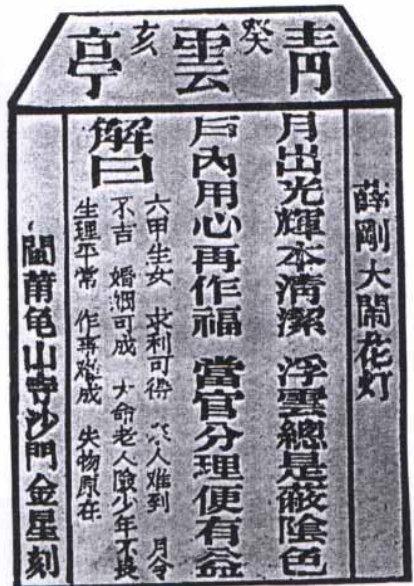
解曰項	峇峇馬來語譯文
六甲	Perempuan Bunting
作事	Chari Kerja
婚姻	Jodoh Kawin
失物	Hilang Barang
治病	Orang Sakit
行人 / 來人	Orang Belayar
經商	Buka Kedai
官事	Berchara
家運	Woon Nasip
墳墓	Hong Swee Kubor

宗教的最主要功能之一，就是滿足人們的心靈需求，而籤可視為是一種人神溝通的靜態媒介。籤的解釋所反映出來的，往往是信徒最想瞭解的疑問，反過來看，信徒的疑問也常常牽引著籤所要羅列的解釋項。因此，從表 2-6 譯者所羅列出來的籤解項目看，峇峇們生活中最常關心的議題是甚麼？單看解曰項便可一目了然；而這，也讓我們有機會透過籤文側面去瞭解早期峇峇人的生活面貌與精神意識。

籤的結構中，除了「解曰」項，與文學較有關係的，則屬「籤的詩文」與「解籤典故」兩大項。籤詩一般分為古體、五言絕句和七言絕句三種，其中又以七言最多，根據台灣三縣廟籤的分析，其比例甚至高達 95%。⁵⁹這裡我們且不談籤詩本身的評價問題，我們直接轉入籤詩譯文看：

⁵⁹ 參考林修澈，《廟全記錄：台灣省廟呈現出來的文化資產與生活意義·研究篇》（台北：台灣省政府文化處，1998），頁 188。

表 2-7：《青雲亭六十甲子籤書》原文與峇峇馬來文譯文對照

原文	譯文
<p>例一</p> 	<p>No: 1 Kak Choo 甲子</p> <p>Raja Song Jin Chong pergi jemput dia punya mak (Li Sim Wee) bawa pulang. Mata hari sudah keluar, angin sama awan sudah hilang dia punya terang cahaya satu dunia seperti satu jalan terus tidak ada bengkok, yang kemintahan semua-nya sela-mat dan pengaman.</p> <p>Perempuan Bunting- Beranak Jantan dan selamat. Chari Kerja- Nanti dapat. Jodoh Kawin- Baik boleh hup. Tahun kuda tabaik Hilang barang- Chari nanti dapat. Orang Sakit- Tua rusa baik. Muda taberapa Orang Belayar- Nanti sampai. Buka Kedai- Baik untong. Berchara- Boleh menang. Woon Nasip- Baik untong. Hong Swee kubor mengadap sbala mata hari idop baik.</p>
<p>例二：</p> 	<p>No: 60 Kwi Hye 癸亥</p> <p>“Seet Kong Tye Law Wah Teng dia sudah mabok kasi raja terperanjat”</p> <p>Bulan keluar terang tentu baik selamat. Awan kepong bulan tentu tidak terang. Di-dalam rumah tarok niat bikin hati baik. Kalau pergi berchara tentu nanti menang. Ini chiam see bulan terang ameh.</p> <p>Perempuan Bunting-Beranak Perempuan. Chari Kerja- Susa dapat. (Ini bulan dapat) Buka Kedai- Nanti rugi. (bulan terang untong) Jodoh Kawin- Boleh Hup. Berchara- Nanti menang. Hilang Barang- susa dapat. (bulan terang bolah dapat) Orang Belayar- Lambat pulang. Orang Sakit- Lambat baik. (bulan terang baik) Woon Nasip- Tak baik. (Baik untong) Hong Swee kubor- baik.</p>

首先，我們從籤詩典故看：

例一：

典故是「宋仁宗認母」，原出自的包公案中著名的「狸貓換太子故事」，籤原文全篇並未提及仁宗生母之名，但峇峇馬來語譯文卻加入了仁宗母親的名字“**Li Sim Wee**”（李宸妃）。

例二：

典故是「薛剛大鬧花燈」（“**Seet Kong Tye Law Wah Teng**”），然而峇峇馬來語譯文卻補充說明“**dia sudah mabok kasi raja terperanjat**”（他（薛剛）醉了讓皇帝嚇了一跳）。

再來看「解曰」內文：

例一：

以婚姻(Jodoh Kawin)的「解曰」為例，原籤文僅解說「婚姻好」，峇峇馬來語譯文則是：“**Baik boleh hup. Tahun kuda tabaik**”（好可以合。馬年不好）

例二：

問「失物」(Hilang barang)，原文解曰：「失物原在」，譯文則說：“**susa dapat. (bulan terang bolah dapat)**”（難得。（月明可得））

沿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知道，譯者不僅對漢書典故瞭若指掌，對漢詩文的理解能力更是高深，因此我們可以推測，這位峇峇譯者不僅峇峇馬來文了得，其漢文造詣必定也頗為深厚，更確切說一定是一位具備深厚中國通俗文學根底的峇峇，不然他不可能在譯文中對典故加以解說。有趣的是，在訪問期間，筆者碰上一位當時（2003年3月）仍在英語源流國小三年級唸書的小峇峇，他不懂得說漢語，但在峇峇長輩的教導下，卻看得懂古漢文，且還當場用瑑刻篆書的方式把他的漢文名字寫下贈送給筆者，而這個小插曲，則印證了不會講漢語不見得不懂漢文的推理。

再者，青雲亭所用的這套籤源自「天上聖母六十甲子籤」，這套籤種在台灣非常普遍，以台灣縣三籤為例，「天上聖母六十甲子籤」便佔了全數籤種的41%⁶⁰。因此，和Holo文化淵源頗深的峇峇，他用的籤詩所反映出來的宗教意緒，必然與台灣各縣民信仰的宗教意義有某程度的共通性，故此筆者在這裡嘗試以峇峇人所用的這套籤詩與台灣籤詩（典故）研究的成果作一比較：

⁶⁰ 參考林修澈，《廟全記錄：台灣省廟呈現出來的文化資產與生活意義·研究篇》，台北：台灣省政府文化處，1998，頁188；林修澈，〈宜蘭縣內廟籤的運籤〉，收入《「宜蘭研究」第三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宜蘭：宜蘭文化局，1990），頁21-62。

表 2-8：馬六甲青雲亭之峇峇馬來語解籤書

原文籤詩	峇峇馬來語翻譯 CHIAM SEE	解籤典故
第一首籤詩 甲子	No: 1 Kak Choo	宋仁宗認母
第二首籤詩 甲寅	No: 51 Kak Inn	薛交兄弟奪繡毬
第三首籤詩 甲辰	No: 41 Kak Sin	周德武夫妻相認
第四首籤詩 甲午	No: 31 Kak Goh	大舜耕田
第五首籤詩 甲申	No: 21 Kak Sing	逃入招國關
第六首籤詩 甲戌	No: 11 Kak Soot	烏精亂宋朝
第七首籤詩 乙丑	No: 2 It Tiew	鏢國公賞月暗察薛仁貴
第八首籤詩 乙卯	No: 52 It Baw	石朋貴回家認妻
第九首籤詩 乙巳	No: 42 It Soo	河東龍虎鬥
第十首籤詩 乙未	No: 32 It Bee	秦檜請鬼入宅
第十一首籤詩 乙酉	No: 22 It Yew	韓文公過秦嶺白虎攔路
第十二首籤詩 乙亥	No: 12 It Hye	劉智遠戰瓜精
第十三首籤詩 丙子	No: 13 Phia Choo	劉物歲行船沖山
第十四首籤詩 丙寅	No: 3 Phia Inn	桃園三結義
第十五首籤詩 丙辰	No: 53 Phia Sin	姜太公釣魚老婆送飯
第十六首籤詩 丙午	No: 43 Phia Ngoh	李世民遊地府
第十七首籤詩 丙申	No: 33 Phia Sing	姜太公卜卦定吉凶
第十八首籤詩 丙戌	No: 24 Phia Soot	翠玉徹散遇貴人
第十九首籤詩 丁丑	No: 14 Teng Tiew	良女試雷武陞
第二十首籤詩 丁卯	No: 4 Teng Bau	孫悟空過火燄山大難險死
第二十一首籤詩 丁巳	No: 54 Teng Chee	朱壽昌母子相認
第二十二首籤詩 丁未	No: 44 Teng Bee	文王請姜太公為軍師
第二十三首籤詩 丁酉	No: 26 Teng Yew	姜太公渭水釣魚
第二十四首籤詩 丁亥	No: 25 Teng Hye	楊廣追趕太子李世民
第二十五首籤詩 戊子	No: 26 Boh Choo	鳳嬌母子誤中奸計
第二十六首籤詩 戊寅	No: 15 Boh Inn	范丹妻殺九夫後得范丹為夫
第二十七首籤詩 戊辰	No: 5 Poh Sim	胡完救鳳嬌母子
第二十八首籤詩 戊午	No: 55 Boh Ngoh	李存孝五龍會
第二十九首籤詩 戊甲	No: 45 Boh Sing	關公斬蔡陽
第三十首籤詩 戊戌	No: 35 Boh Soot	豬八戒過糞灘
第三十一首籤詩 己丑	No: 26 Kee Tiew	狄仁傑送書請鮑自安
第三十二首籤詩 己卯	No: 16 Kee Bau	韓信九里山埋伏
第三十三首籤詩 己巳	No: 6 Kee Chee or Kee Soo	洛陽橋浮觀音
第三十四首籤詩 己未	No: 56 Kee Bee	潼關遇馬超
第三十五首籤詩 己酉	No: 46 Kee Yew	吳漢殺妻
第三十六首籤詩 己亥	No: 36 Kee Hye	蘇秦落祠堂
第三十七首籤詩 庚子	No: 37 Kang Choo	正德君新入白牡丹
第三十八首籤詩 庚寅	No: 27 Kang Inn	三請孔明先生
第三十九首籤詩 庚辰	No: 17 Kang Sim	楊文廣被困柳州城
第四十首籤詩 庚午	No: 7 Kang goh	三元會
第四十一首籤詩 庚申	No: 57 Kay Sing	包龍圖審月英

第四十二首籤詩 庚戌	No: 47 Kay Soot	孟姜女送寒衣
第四十三首籤詩 辛丑	No: 38 Sing Tiew	迫父歸家
第四十四首籤詩 辛卯	No: 28 Sin Baw	益春留傘
第四十五首籤詩 辛巳	No: 18 Sin Chee	孔子與小兒論答
第四十六首籤詩 辛未	No: 8 Sim Bee	江中立得妻
第四十七首籤詩 辛酉	No: 58 Sing Yew	劉永作官福蔭妻兒
第四十八首籤詩 辛亥	No: 48 Sin Hye	包龍圖審郭懷
第四十九首籤詩 壬子	No: 49 Jin Choo	佛印禪師與船婆答詩
第五十首籤詩 壬寅	No: 39 Jin Inn	斷機教子
第五十一首籤詩 壬辰	No: 29 Jim Sim	宋太祖被困河東城
第五十二首籤詩 壬午	No: 19 Jin Nghoh	蘇秦假不第
第五十三首籤詩 壬申	No: 9 Jim Sing	聖母壽誕諸仙慶賀
第五十四首籤詩 壬戌	No: 59 Jin Soot	呂玉爲父母求壽
第五十五首籤詩 癸丑	No: 50 Kwi Tiew	背義僥金
第五十六首籤詩 癸卯	No: 40 Kwi Baw	楊瑄得病
第五十七首籤詩 癸巳	No: 30 Kwi Chee	蔡坤投入吳小姐花園
第五十八首籤詩 癸未	No: 20 Kwi Bee	白蛇訢言到南海
第五十九首籤詩 癸酉	No: 10 Kwi Yew	皇都市送麟兒
第六十首籤詩 癸亥	No: 60 Kwi Hye	薛剛大鬧花燈

表 2-9：台灣籤詩典故來源研究⁶¹

《廟全記錄：台灣省廟呈現出來的文化資產與生活意義·研究篇》	《台灣地區舊廟籤詩文化之研究——以南部地區百年寺廟為主》
<p>三縣共 1140 條典故（其中 25% 未能辨識出處，35% 出自三十種故事）</p> <p>數量性排行：</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東周列國志〉（10%） 2. 三國演義（9%） 3. 楚漢相爭（7%，包括漢朝故事最多，昭君和番） 4. 薛家故事 5. 楊家故事 6. 〈封神榜〉（姜子牙故事） 7. 明朝故事（正德君、萬曆帝、海瑞） 8. 孔子故事 9. 三代故事 10. 八仙故事（韓愈） 11. 西遊記 12. 唐朝故事（隋唐演義） 13. 宋朝故事（趙匡胤故事與包公案） 14. 民間故事（孟姜女、山伯英台、白蛇傳、董永七 	<p>典故來源分爲三大類：</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正史史事：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虞舜、夏禹、商朝、周朝、秦朝、西漢、東漢、晉朝、北朝、隋朝、唐朝、五代、宋朝、明朝） 2. 民間流傳故事：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I：長篇小說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i) 講史話本（東周列國誌、封神演義、三國演義、兩漢演義、隋唐演義、楊家將演義、孔子演義、月堂演義、薛仁貴征東、薛丁山征西、說岳全傳、薛剛鬧花燈、前後七國志） (ii) 神魔小說（西遊記） (iii) 公案小說（海公大紅袍、海公小紅袍、包公案） (iv) 俠義小說（綠牡丹、粉妝樓） II. 短篇故事：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i) 明之擬宋市人故事（今古奇觀、醒世恆言、警世通言）

⁶¹ 本表乃筆者根據以下資料整理而得：林修澈，《廟全記錄：台灣省廟呈現出來的文化資產與生活意義·研究篇》（台北：台灣省政府文化處，1998），頁 209-210。王文亮，《台灣地區舊廟籤詩文化之研究——以南部地區百年寺廟爲主》，（台南：撰者[國立台南師範學院鄉土文化研究所]，2000），頁 126-170。

仙女、陳三五娘、桃花過渡、鄭成功)	(ii) 愛情性質故事 (喻世明言、二度梅、白兔記、孟姜女、留鞋記、白蛇傳、琵琶記、漢宮秋、風雪破窯記、陳三五娘、西廂記、梁山伯祝英台) (iii) 神鬼志怪故事 (八仙故事、神仙傳、搜神記) III. 傳奇、傳說、掌故： (周朝、漢朝、唐朝、宋朝、明朝、清朝) IV. 佛教故事 (佛祖、觀音故事) 3. 戲劇故事： (宋元戲文、元雜劇、明戲文、明雜劇、明傳奇、清雜劇、清傳奇、國劇 (平劇)、布袋戲、皮影戲)
-------------------	--

峇峇在宗教信仰上，在 20 世紀中葉以前，除了少數西化峇峇改信西方宗教，傳統上，峇峇家庭對於承自父系的漢人民間信仰仍是非常堅持的，神明祖先的祭拜幾乎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各種節慶祭祀活動更是峇峇文化的重要命脈。回歸到歷史現場，峇峇馬來語中國通俗文學翻譯出現在峇峇文化最鼎盛的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峇峇信仰重鎮青雲亭內的峇峇馬來文解籤書也在這個時候翻譯出來，再與籤詩典故的出處研究相比較，三者疊合，我們有理由相信，中華文化中的文學與價值觀念，除了透過實質的文學作品（書面翻譯和說唱文學），也間接透過俗民的信仰，隱性的向峇峇作「置入性」灌輸。換言之，中國通俗文學的接觸，不僅透過書面翻譯文學，也藉由傳統民間信仰與峇峇人溝通。

最後，筆者嘗試歸納出幾點這本峇峇馬來文解籤書的價值所在：

一、從文學與宗教學的角度看

它說明了中國文學對峇峇的影響，不僅是文學性，也帶有宗教的深層意緒。同樣的，集合了儒、釋、道三教的漢人民間信仰對峇峇的潛移默化，除了宗教性，也或多或少帶有中國文史性質。換言之，峇峇透過中國通俗小說的翻譯去瞭解中華文化之餘，他們在傳統民間信仰上的傳承，也使他們對中華文化和傳說故事的瞭解不曾中斷。

二、峇峇生活中關心的議題

從解籤書譯本內選譯的「解曰」項目，可從中窺見早期峇峇的生活面貌，即在峇峇生活中，他們最常面對或與他們生活息息相關的事情是甚麼？早在原始宗教時期，宗教與文學之間已開始互有牽連，尤其在初民對自然的崇拜中，便已初步形成了祭祀歌、神話、史詩和古老的傳說。此後，宗教作為人類思維發展的一種型態又以其「感染力」在不同程度上支配著文學的精神及價值觀念。在文學的流佈過程中，宗教又常擔任文學之先導，例如印度文學因著佛教的傳入而對中國各民族的文學產生影響，而中國西北民族的文學也因著伊斯蘭教的傳入而得到深

化。同理觀之，自唐宋發展興盛的中國通俗文學亦因其隱性架構中所蘊含的「宗教意識」而廣被民眾接納，進而成爲日常生活之餘的重要寫照（文學），給予庶民沒一般的「望想」。與此同時，在相同的社會文化中，這樣的民族宗教意識亦穿透了傳統社會階級，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文字掌控階級（尤其傳統儒家教育下的文人）之思維，以通俗小說創作中的神仙謫凡度脫的敘述爲例，其架構安排往往受中國的土產宗教（道教）意識所影響，在正史與民間文學材料的取捨之間，作者與讀者心中的哪一點「共鳴」，正是貫穿作品架構、影響敘述安排的有機樞紐。也因此，透過這本峇峇馬來語籤文譯本，我們可以瞭解到，在峇峇的日「常」生活中，他們的「非常」嚮往究竟是甚麼？⁶²是重男輕女的生育觀？是盼望遠航親人早日平安歸帆？還是堅持門當戶對的嫁娶觀？

三、峇峇涵化現象的反映

若從民族學的角度切入，籤詩譯文反映出了峇峇的涵化現象。在籤文抄寫其間，筆者赫然在譯文中翻現了伊斯蘭名詞 “Allah”，分別出現在 No: 2 It Tiew 乙丑、No: 7 Kang Goh 庚午、No: 8 Sim Bee 辛未、No: 14 Teng Tiew 丁丑、No: 19 Jin Ngoh 壬午、No: 41 Kak Sin 甲辰、No: 49 Jin Choo 壬子及 No: 59 Jin Soot 壬戌等籤詩譯文中。

列一：

No: 7 Kang Goh 庚午（原文本：第四十首籤詩）

典故：

三元會

（Sam Guan Hong satu orang dapat tiga pangkat Chong Guan, Huay Guan, Pong Guan）

⁶² 所謂「常S非常」之間，大略可歸納出以下幾點對比：

常	非常
人（凡）間	域外之境（仙界、陰間）
無常（變）（虛）	不變（實）
有限	無限
正史	野史
後代（子孫繁衍）	自身生命精神延續

參考李豐楙教授相關文章：〈崑崙、登天與巫俗傳統——楚辭巫系文學論之二〉，「第二屆中國詩學會議」，1994；〈由常入非常——中國節日慶典中的狂文化〉，刊《中外文學》，22卷3期，第十七屆全國比較文學會議論文，1993，頁116-154；〈節慶祭典的供物與中國飲食文化——一個「常與非常」觀的節慶飲食〉，第四屆中國飲食文化學術研討會（臺北：中國飲食文化基金會與漢學研究中心主辦，1995）；〈屈原《離騷》中的服飾象徵：一個非常觀的考察〉，中國文學研討會，1997。〈中國服飾文化的「常與非常」結構〉，「思維方式及其現代意義：第四屆華人心理與行為科際學術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及臺大心理系主辦，1997）；〈嚴肅與遊戲：道教三元齋與唐代節俗〉，收入《傳承與創新：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十周年紀念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9），頁53-110。

詩文：

平生富貴成祿位	Idopan jerki tentu daripada Tuah Allah
君家門戶定光輝	Lu punya rumah tangga ada selamat
此中必定無損失	pengalaman ini pasal tentu tidak nanti pergi
夫妻百歲喜相隨	Laki bini dua orang bersuka hati sampai tua

在籤詩翻譯行文中，譯者經常把與「神明」保佑相關的運氣或福氣譯成“**Tuah Allah**”(阿拉的祝福或保佑)。從“**Allah**”一詞出現在峇峇民間信仰中漢文化色彩非常強烈的籤書這一事實看來，峇峇不僅受原始馬來文化涵化，在早期漢人、馬來人交流異常“*laissez-faire*”(自由放任)的情況下，連排他性強烈的伊斯蘭文化，峇峇都可以跨越包容。從民族關係的角度看，在沒有政治因素、現代民族主義等意識的干擾下，民族邊界的靈活度其實是非常大的，涵化的現象也特別容易發生。

圖 2-II：《三國》譯本預告及《西游》譯本封面

KALU INI CHRITA SAM KOK,
suda di tulis-kan habis, saya mau tulis ini
chrita chrita ka-bawa, nama-nya :—
Chrita pasal Ter-tawa (Twan Karot & Co.)
Do. Kim Kō Ki Kwan (smua).
Do. Leow Chai (lābeh korang,
yang ada ber-guna).
Do. Pow Kong Ann (Pow Chin).
Do. Si Kong Ann (Si Soo Loon).
Do. Na Kong Ann (Na Teng Gwan).
Do. Swi Hoo, atau Song Kang.
Do. Kim Sek Yan. (Lim Ai Chu.)
Do. Chey Tian Hoey Siūh.
Do. Wan Ju Yak.
Do. Keng (Gū Cheong).
Do. Sian Chin Ek Su.
Do. Ho m Chong Lan.
Do. C'hit Hiap.
Do. Cheng Tong.
Do. Cheng Sai.
Do. Hō Gūh Tai.

INI CHRITA CHRITA MANA YANG SUDA DIKIN, SZAUA BULEH
DAPAT BLI DI SINGAPORE.
Ruma No. 55, UPPER CHIN CHEW STREET.
Gudang Twan Donaldson, No. 19, COLLYER QUAY.
Kongsi-Madat No. 33, TELUK AYER STREET.
PENANG, Messrs. Thean Chee & Co.
Chop "Loon Hong," BEACH STREET.
BATE GANTONG,
Sole Proprietor.
SINGAPORE, 15th December, 1892.

遊 西
CHRITA
(SEH YEW
PASAL
KOU CHEY THIAN
天 齊 猴
DI ZAMAN TANDUN,
DAN
TONG THYE CHU
子 太 唐
PERGI DI NEGRI
SEH THIAN C'HU KENG
經 取 天 西
DI ZAMAN
TONG TEOW
VOLUME V
BY
CHAN KIM BOON
PENANG & SINGAPORE
Printed at the "KOH'S PRESS," Press, 174, Teluk Ayer Street.

資料來源：新加坡國家圖書館館藏

圖 2-IV：峇峇馬來語報章 *Bintang Timor* (《東方之星》)



資料來源：新加坡國家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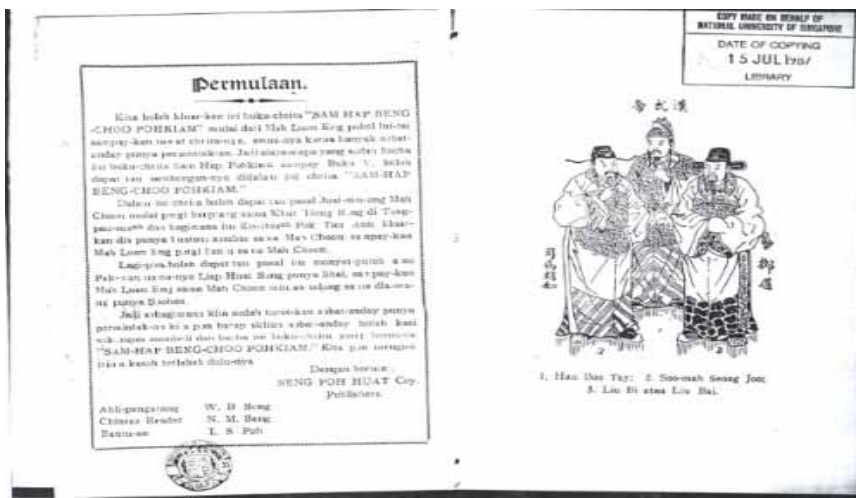
圖 2-V：峇峇馬來語譯本：《紅面小姐》(左) 及《王昭君和番》(右)



資料提供：Persatuan Peranakan Cina Melaka (馬六甲州峇峇公會)

照片拍攝：黃慧敏，2003/03/17，於馬六甲州峇峇公會會館

圖 2-VI：峇峇馬來語譯本：《三合明珠寶劍》(上：封面，下：序言&插圖)



資料來源：新加坡國立大學圖書館館藏